

社会批判／译学社·—.1930, no. 1(1930, 3)～[?]·—

北平：燕山书店，1930～[?].

; 21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16。原件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1930, no. 1～no. 2 (1930, 3～4)

社會批判

DAISU
10.5.6. No. 1.

創刊序

創刊號

目次

怎樣才能撤廢領事裁判權.....	劉行
偉大的轉換之一年.....	筱江譯
國際主義底前驅.....	江峙譯
辯證法淺釋.....	沈平譯
一九二九年第三季的 세계經濟.....	李餘譯
蘇維埃經濟的五年計劃.....	王果譯
英美的鬥爭與英國的帝國統一.....	山夫譯
胡佛與麥克唐.....	山夫譯
現代經濟學講座.....	河上肇
第一講 “辯證法的唯物論”.....	江漢譯
書報介紹及批評.....	曉香者
編後.....	編者

1930.

1.

投 稿 簡 約

1. 本刊歡迎投稿，不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有系統的介紹或創作。
2. 來稿請橫寫，並須清晰。
3. 來稿如不用時，一律退還。
4. 來稿於揭載後，酌致薄酬。
5. 來稿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惟刊登時如何署名，聽作者自定。
6. 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譯學社轉社會批判社收。

社 會 批 判 (創刊號)

1930. 3. 15 日 出 版

編輯者	譯 學 社	定 價	每 冊 二 角
出版者	燕山書店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發行者	燕山書店		全 年 二 元

社 會 批 判 社 啓 事

本雜誌發行及印刷事務，現已完全委托北平燕山書店辦理，此後決每月出版一冊，定月之十五號出版。此後如有關於發行事務，請逕函書店接洽。編輯事宜，仍寄交本社可也。

一九三十，三，十五日

施
505
104

怎樣才能撤廢領事裁判權？

緒 言



去年年底國民政府煥然發表了撤廢領事裁判權的對內的宣言以來，今年正月中央黨部還訓令了各省黨部召集市民大會，響應政府的意旨，向國民表示得似乎是要喚起民衆，撤廢領判權。北平市民因此在上月末（二十五日？）明光在天安門領教了些名論卓說，並在黨報拜讀了好幾篇關於撤廢領判權的大作。可是到現在除了在街頭上發見幾條輝煌的標語外，健忘的北平市民似乎還在繼續他們枯燥的生活。當然更不用說，帝國主義的對方始終好像醒獅一般，淡然，怡然，毫不驚慌，因為他們早已領會了這個運動根本是對內的步驟，是足以增進中外人民之關係（見外交宣言），用不着他們大驚小怪的擔心。

那末，這個運動為什麼冷得這麼快呢？是不是因為問題太小了，用不着民衆費心思，只須我們革命的外交家王正廷先生與帝國主義者和氣藹藹的一席圓卓會議，帝國主義者馬上惠然地肯放

006296

棄領判權呢？否否，這個問題是關乎中國民族解放的根本問題；南京政府的宣言不過是對內的，黨部的市民大會不過是破除寂寞的反響；其主眼似乎不在於鼓勵民衆的熱度，因為民衆反帝的熱度一起，確是有碍親睦的邦交。

那末，我們還是應該與帝國主義敦睦邦交呢，還是應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廢領判權，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出境呢？帝國主義者是狼，我們是羊，為什麼我們能同他們親善呢？我們要求民族的獨立，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撤廢領判權，打倒帝國主義。因為不平等條約及領判權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政治上法律上的保障，中國民族陷於半殖民地的主要條件。

那末，我們怎麼才能撤廢領判權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知道領判權的意義，其次撤廢領判權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再其次應該知道撤廢領判權與中國社會階級的關係，然後才能知道撤廢的方式及其批判。

一、領判權的意義

領事裁判權在表面上似乎是因為中國的法律制度不良，各帝國主義的政府，不願意其國民在中國犯法的受中國法律底審判，須要由他們的領事依照他們本國的法律判罪。這是不正確的觀察。疏忽了領判權是帝國主義在武力保障之下，縱容他們的無賴漢攬亂中國的秩序，蹂躪壓迫敲詐中國的工農，嗾使中國的地主豪劣以及買辦階級作猛烈的鷹犬的惡行。原來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目的，

在於使中國隸屬化。對於這個目的呢，他們什麼無賴漢的劣跡都公然地推賞。帝國主義者原來就不是道學先生。然而這是容易引起中國農民的反抗——義和團就是一個好例。所以這些還不是領裁判權最主要的本質。又為帝國主義者所鼓吹的，領裁判權在於保護自國的僑民，這也是明明騙人的話。他們確不是那麼的寡慾家。固然他們因為有了領裁判權，可以有本國的法律為之保障，這也是事實。然而牠的本質却不僅在於保護自國的僑民底生活，而重在於替資本家向對手國作有效的穩固的經濟上及政治上的侵略。

我們想了解領事裁判權關於這點的特質，非從全面地了解資本主義的特質不可。

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視為生命者，無過於商品市場及原料供給地——殖民地——的占據，這是研究過近代經濟組織的人所周知的事實。因為他們佔據了廣大的商品推銷市場及低廉豐富的原料供給地，所以他們的資本家才能剝削到高率的利潤。高率的利潤，這是一般資本家所竭盡全力營求的對象。他們為維持這高率利潤的繼續產生，必須永久地安全地將這殖民據為己有，這是很明瞭的事實。換句話講，因為資本家熱望永久剝削高率的利潤，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得不斷然永久戰取殖民地的統治權。那末，他們的產業才能稱心如意地發展，於是全社會底財富不得不加速地集中於少數金融資本家的手中。這是一切資本主義的帝國的國家底本質，任憑他們如何高唱和平親善，要之是狼穿羊皮，不過想藉此多吃幾隻羊罷了。

我們中國是地廣人衆，原料豐富，勞力低廉的國家。因此正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群狼，必須爭奪的肥羊。所以自鴉片戰後，五口通商以來，中國變成了帝國主義者理想上的商品市場及原料供給地。換句話說，中國正是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們剝削意料所不及的高率利潤的中心地。那末，他們為維持這意料所不及的高率利潤繼續地永久地產生，帝國主義的羣狼必須斷然奪取商品推銷的一切市場的統治權！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商品集散中心地，如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香港大連等處的統治權，於帝國主義的繁榮確有密切的關聯。這種統治權叫作什麼呢？即是所謂領事裁判權！所謂領事裁判權，即是帝國主義對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統治權底同義語。換言之，領事裁判權正是帝國主義使半殖民地的中國永久奴隸化的最高表現。例如上海租界正是這樣一個好例。

二、領判權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如上所論，帝國主義商品經濟底侵略，必須有武力為其後盾。這武力的保障在法權上的表現，即是所謂領事裁判權。所以領事裁判權對於帝國主義的存在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是上面所講過的。現在再舉實例來詳說關於這些的關係。

譬如上海的租界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領事裁判權鞏固地統治着。正是因為牠在帝國主義底武力擁護之下，所以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可以安穩地而且優越地推銷他們的商品，吸收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料，而產生他們莫大的財富。假如領事裁判權真正

撤廢了，中國政府對於外國資本家有了管理權，不但一切無廉恥的行爲譬如經營賭場，賽狗，賽馬，販鴉片，賣槍械以及其他大規模的騙財，掠奪，殺人等事辦不到；即如所謂正規的企業經商，銀行工廠甚至如學校報紙等，亦必失其一切固有的優越條件，以至於倒潰，甚至於查封沒收。這些却是關乎他們的商品推銷及企業的盛衰，當然是他們的存亡的問題。假如一旦撤消了領事裁判權，即是中國有了統治外僑的法權，那末，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既失却其種種政治上法律上優越的條件，中國政府為保護本國的產業發達起見，且可以盡量課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以巨額的所得稅，甚至可藉詞沒收。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領事裁判權，中國本國的產業反為國課所累，而外國資本家獨可安全地發展。這些是給外國資本家壓倒中國的產業的決定權。

更進一步講，帝國主義者不但利用領事裁判權，使通商口岸殖民地化，凡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買辦所至之地，甚至其商品所集散之地，帝國主義的教會所在之地，亦無不因此殖民地化。總一句話說，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領事裁判權，中國全境陷於準殖民地。譬如在各省的市鎮甚至農村之中，差不多到處有教會。這些教會因為中國政府對於牠沒有統治的法權，所以往往包庇地主豪劣，隱然獨成王國。這是我們所常見的。也是屢次引起仇教運動，及義和團反帝運動底主要原因。換一句話講，中國農民對於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惡感——反抗心，無一不是由於帝國主義者在領事裁判權的保障之下所作的惡行。並且教會所在地，往往成為

帝國主義的商品流行地，國產工業品反受排斥。所以假使中國一
旦回復了統治外人的法權，撤廢了領事裁判權，帝國主義者必定
失却以上種種的特殊利權，在全局上看來，是失却了他們對於準
殖民地無上的統治權，這是意義中國民族的獨立。中國民族如果
從帝國主義的羈絆底下解放，對於帝國主義可有怎麼的關係呢？
這是意義帝國主義的終焉！如果中國民族從國際帝國主義底下解
放，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從中國境內逐出，那末，第一朝鮮台灣
必非日本帝國主義所能保持。朝鮮台灣一旦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
羈絆，對於日本國內有什麼反映呢？無疑地是日本資產階級統治
底覆滅，無產階級統治的代興。至於英帝國主義呢？我們知道英
國輸進中國的商品，大半產自他的殖民地印度埃及緬甸。如果英
帝國主義的商品一旦從中國絕跡，這是宣告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產業底死刑。如果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產業一經覆滅，那末，印
度緬甸埃及等殖民地將非英帝國主義所能隸屬。英帝國主義一旦
失却其殖民地的寶庫，勢必與日本帝國主義同樣，有資產階級所
最痛心的變革。英帝國主義底變革，這對於歐洲各國的政治有決
定的意義，美帝國主義亦將不能獨存，而世界的歷史亦必因此另
開一個燦然的新紀元了！所以中國民族的解放，對於國際帝國主
義的存在有決定的意義。

三、領判權與中國的社會各階級的關係

領判權對於帝國主義本身的利益雖這麼的偉大，對於中國社

會各階級底影響如果全然是同一的呢，那末中國民族全體早應該起來反抗，而自動地把牠撤廢了。這使中國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的領判權所以能够維持這麼久，決不單單靠在帝國主義的武力——當然這是最主要的維持力——上，畢竟是有中國內部某一集團的人——譬如軍閥官僚地主買辦豪劣——作他們的內應。所以領判權雖然是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準殖民地化的武器，對於中國的社會各階級的影響却有相反的要素。我們必須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戰友，才能真正撤廢領判權，獲得中國民族的解放。因為我們真正的目標，不止在手要捉拿少數帝國主義的無賴漢，而是切求民族的解放。更進一步講，如果中國民族不從帝國主義的鐵鎖底下解放，我們單捉住幾個無賴漢也是無益，反而是替帝國主義效勞。如果中國民族一旦真正從帝國主義的鐵鎖解放了，那麼領事裁判權當然不能存在。所以領事權的撤廢，不與民族革命運動密切地聯繫起來，是毫無意義的。元來領事權的本質是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底統治權，所以牠的撤廢不得不不是民族革命運動之一。確實中國民族的解放，是中國今日迫不容緩的要求！但是那個社會的集團能負擔這個任務呢？

(一) 封建地主嗎？不能！絕對不能！在庚子年（一九〇〇）以前，他們確是同樣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在義和團運動之中，確想乘機報復，滿清政府及北方大地主當時是站在民衆的先頭作反帝運動。然而這個運動是農民的反帝運動，同時也是反封建勢力的運動。到了這個運動因為沒有正確的戰術歸於失敗的時候。

候，封建地主階級由反帝變成親帝，因此有一部分的大地方並且變成買辦階級。自此以來封建地主階級對於一切民族革命運動時常勾結帝國主義，圖謀鎮壓，並且出賣民族利益，甘為帝國主義的鷹犬，所謂不平等條約大多數是他們經手出賣的。至於帝國主義呢，既有這樣好的鷹犬，當然樂于利用作更進一步的侵略。況且中國的民族運動與帝國主義的存亡有關，更不得不收買落伍的階級來作他們的鷹犬。所以他們與其說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毋甯說常受帝國主義的帮助，鎮壓國內一切民衆運動。所謂領事裁判權原來就送在他們手裏。至於南方的封建地主呢，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早已帶着了買辦性，同帝國主義是一致的。

(二)至於中小地主呢，他們當然也相當受了帝國主義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些壓迫。然而他們一到革命的農民走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時候，他們斷然放棄反帝的職務，與帝國主義協力壓迫農民了。他們對於領事裁判權的問題原來就缺乏明瞭的感覺，而且不願根本解決。反之他們為圓謀自己社會地位的安全，不惜借重於帝國主義。所以他們對於領判權的撤廢與否，不但不覺到十分的痛苦，並且到了階級對立尖銳化的時候，與帝國主義共同站在消滅革命運動的戰線上。

(三)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實力上戰不過地主階級，而且他們多數與地主階級有密切的關聯，或自身是地主。然而他們自身的利益在於發展產業，使中國資本主義化。可是他們的利益及企圖，必然遭帝國主義的壓迫及排斥，因此他們感覺得受不平等

條約及領事裁判權等等的壓迫，比地主階級更為深切。因為他們要使中國資本主義化，所以他們必須有反帝國主義的本質，同時也必須有反封建勢力的本質。因此他們自五四運動以來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的過程中，他們當時站在革命的民衆的前哨。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段階發展至更高的段階，與他們本身的利益衝突的時候，斷然走了地主階級的陣營。於是不得不與帝國主義妥協，而放棄自己的任務。當然他們對於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不能說是嚴密的一致，不平等條約及領事裁判權，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計，確是想廢棄。然而他們既與帝國主義妥協，與革命的民衆立于相反的地位上，無論如何是個夢想。當然帝國主義者為保護自己的鷹犬起見，必給他們以相當的援助。然而只要是事關他本身的利益，必至斷然地拒絕罷。其實中國的資產階級要忠實地完成他自己的任務却太無力了。

(四)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雖然在數量上比資產階級多，然而其社會的地位多附屬於資產階級，僅有少數的降而屬於無產者。他們多半是由中小地主因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侵略而來的破落者，所以他們感受不平等條約及領判權的痛苦也是很深。所以在革命的初期和資產階級一道站在革命的戰線上，到了革命進展至更高的段階，他們也隨着資產階級大多數退出了戰線。然而這個階級因其社會地位浮沉於壓迫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所以其意識常是遲疑浮動，缺乏戰鬥的意志。因此他雖然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以及上層諸階級的壓迫剝削，不能自動地堅決地和他們

戰鬥。他們是想撤廢領判權，可是大部一旦退出了革命的戰線，更沒有這種力量了。

(五)農民。農民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同時農業生產素來是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講，中國的金融底來源大抵出自農民。然而中國自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以來，流到海外去的財富不下二百兆海關兩。這被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所剝削的巨額的財富大部分是農民的汗血。因此引起農村的破產，而農民陷于半死的地位。這些農民的汗血是怎麼流出去的呢？商品經濟的侵略，加上不平等條約，領判權，關稅的壟斷等政治上武力上的壓迫。那末，農民對於這些壓迫感受到極深的痛苦，這是一定的道理。因此引起農民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的反抗，這也是自然的道理。譬如義和團，廣東的平英國運動等是農民自發的反帝運動。然而屢次的農民反帝運動，其自身亦必有反封建地主的性質，因為他們固然希望反抗帝國主義，即同時希望獲得土地，從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底下解放。因此必然引起地主階級協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他們要抵抗這兩重壓迫，必須有堅固的團結與嚴密的組織，正確堅決的戰術。可是農民因其生活的方式，根本散漫，缺乏組織的觀念。並且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之工人當時落後，所以他們的行動往往反乎時代潮流進行之方向，而有使現代文化回復至較低的水準的傾向。所以農民為主力的運動無往不敗，且容易為一二墮落指導者所出賣或利用。故農民反帝的心思雖切，受領判權之壓迫與剝削雖深，只可為反帝運動主要同盟者，而不能作指導。

者。

(六)工人。他們和農民是站在同等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而是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直接的工銀奴隸，所以他們所受的帝國主義的苦痛確比農民更為深刻。尤其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底工廠商店船舶等作工的工銀勞動者和短工，簡直是他們的奴隸牛馬！換句話說，他們是領判權底下的直接的犧牲者，同時他們對於領判權的認識最為明晰。那末，在本國的資本家的工廠商店船舶等作工的勞動者和短工，就沒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嗎？絕對沒有這回事！他們是由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而來的破產農民，同時是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挾其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等優越條件，壓倒中國的產業的直接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中國的資本家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勢必取償於工人，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他們的階級全體，無論從那點觀察，確是帝國主義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侵略最下層的犧牲者之一。帝國主義者所侵略的這半殖民地的一切重負，都在工人和農民身上。他們既是帝國主義者所侵略的最下層的犧牲者，那末，他們最大的利益在於推翻帝國主義一切在華的勢力。因此他們不得不不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鋒隊，與農民是同站在一條戰線上面。他們在生活上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業組織所訓練，團結力及組織力均在農民以上，而且他們的認識又是這全社會的認識，他們的利益又不得不不是這全社會的利益。所以他們是這社會認識的主體，同時也是認識的客體。因此工人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鋒，同時是而且不可不是這運動的

指導者。然而不是這運動底唯一的分子，必須與其戰友農民作密切鞏固的聯合。因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必須是反封建地主的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運動，如果不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沒有意義而且不會成功。

四、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及其批判

如上所論，撤廢領事裁判權，並不單是要求由中國的法律審判洋犯人就可完事，而是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底一部分。中國的民族革命如果不成功，我們是沒有方法可以徹底解決的。那末，我們要徹底地撤廢領判權，非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積極進行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不可！與帝國主義的羣狼作屈膝的哀求，只有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權受相當的擴大，絕對不能達到目的。譬如上海臨時法院的改組對於領判權只是一小小部分的變更，談不上收回。可是這一小部分的變更，我們的外交官不知經了若干次的和顏悅色的哀求式的談判，好不容易產生新協定。這新的協定只是在外表上變更了一兩點，對於領判權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工部局可以任意辦理華人五十元以下罰金的案件，即是多送給了帝國主義任意剝削訛詐壓迫逮捕虐待我們窮苦同胞的權限——因五十元以下罰金的案件，多半是鴉片賭博毆打等——。於是中國的買辦階級從此在中國歷史上多添了一件出賣民族利益的功勳，我們窮苦同胞又被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再打進一層地獄了！聯此一點，我們可以用和平談判達到廢棄不平等條約領判權

等等的話，只是中國現在的買辦階級出賣民族利益冠冕堂皇的欺騙！

又如關稅協定，名為自主，其實等於由中國的買辦階級來代替帝國主義者保護他們的商品經濟的侵入。其中最明顯的將日本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商品中最主要的棉紗列入第七等關稅，課以極輕的入口稅。試思中國今日最主要的工業就是紡織。如果我們要保護中國的紡織業，對於舶來品非課以極重的入口稅，或全然禁止不可。可是中國的買辦階級為保障帝國主義壓倒中國的產業計，對於他們的商品特別垂青。於是我們所執望的關稅自主幾等於零，且增加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穩固的保障！

也許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等可以不用革命的手段取消，如果中國政府自動地在政治上法律上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能給以絕對的保障！那是帝國主義所求之不得的，他們為什麼不肯撤消呢？可是我們三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被壓迫同胞名實相符的作了帝國主義的奴隸，中國永遠是名實相符的殖民地了！

如果我們不願意作帝國主義的奴隸，不願意為他人所販賣，只有一個辦法：站在工人階級指導之下，一致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封建地主等。換句話說，我們只有在工人階級指導之下，工農聯合戰線之內，徹底地執行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才能無條件地撤廢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才能徹底地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束縛底下。

或者有人會說在工人階級領導底下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

命。我們中國產業落後的國家，根本就沒有大資本家，那麼這種革命是不可能，並且是有害的。因為我們最要緊的是在有鞏固的有能力的中央政府。由這中央政府獎勵產業，使大家有衣服穿，有飯吃，然後才能有力量與帝國主義作一死戰，將他們趕出中國。如果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豈不是把中國剛才一點點的產業資本家摧殘，必至民不聊生，陷于塗炭。這樣不但不能打倒帝國主義，反要召帝國主義的瓜分，陷于萬劫不復之境，豈不是誤了中國的前途嗎？現在不能撤底地廢棄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只好將就，不得不待諸來日。

反對的要點，在於必須先發達資本主義，使國富兵強，然後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這是今日一般所謂智識分子代表的見解。現在假使這種意見是對的，再看中國是有這種可能沒有。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麼確實是走這條路好；如果沒有呢，這是一個有害的幻想，帝國主義永無打倒的時候了。

關於中國有無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的問題朱新繁君在他最新發表的“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裏面，討論得狠詳細。可是他經過詳細的調查，及周密的統計之後，証明了這種可能却是絲毫也沒有！他的結論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及封建殘餘的剝削摧殘之下，中國產業是不能向上發展。原書裏面講得狠詳細，現在無庸我來引証，讀者如果想知道這回事，請讀原書好。

我們現在因就歷史講，中國自一八九八年（戊戌年）以來，社會各階級企圖何嘗不是想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戊戌政變根

本就是商業地主階級想利用封建君主回復君權的企圖，發展資本主義的計畫。假使那時成功了，中國確是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大路，到了現在不但早取消了不平等條約，並且已經是帝國主義之一了。可是當時的商業地主階級的質量太薄弱，而且官僚地主對於資本主義根本缺乏理解，是以參加的少，所以他們戰不過封建貴族階級，遽急地失敗了。辛亥革命僅僅推翻了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商業資本家階級走向資本主義的企圖，却為封建地主階級協同帝國主義所擊敗，而釀成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封建地主階級底統治。到了民國五年中小商業資產階級聯合幼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工人等雖然推翻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想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可是又為中小地主協同帝國主義所擊破，而釀成十年間軍閥的混戰。到了民國十五年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工農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地主，官僚，買辦等而實行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到了工農的勢力增大，工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於是聯合戰線內的階級對立頓然尖銳化，他們就急急退出戰線，反與地主軍閥及帝國主義妥協，而壓迫革命的民衆了。至今他們固然在想走上資本主義的大路，可是既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會合，在事實上早已證明了是不可能。關於這點，朱君的書上詳細地討論了，現在無容多講。

萬一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只有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發展其殖民地資本主義。可是這個可能性對於中國是有害無益，而且帝國主義自身正在日薄西山，未必有這般的力量。第一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革命運動正在勃興，第二他們自身間包藏了不可和解的矛盾。綜計中國不能走向資本主義的原因，不外以下四點。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太少，敵不過封建殘餘；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在質的方面，根本是半殖民地的資本家，與封建地主的關係太深，而且沒有雄厚的資本，及政治的優越，來克服帝國主義的競爭者；第三帝國主義者現在所要求的是政治的反動，根本壓迫一切革命運動，況且中國的革命與帝國主義者有存亡的關係；第四世界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中，已經確立其領導權，中國的革命明白地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那末，資本主義的道路既不可能，只有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了？這也是不正確的觀察。因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對資本主義而言。就中國自身來看，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封建殘餘至今還是一個支配的勢力。必須打破這個勢力，產業才有發達的可能。可是反封建的革命，即是資本主義的民權革命。然而另一方面，本國資本主義雖不發達，可是全國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之下。不打破這個勢力，中國的產業也是無發達的可言。所以中國的革命，必然又是民族革命。照一般原則講，這個革命必然是民族資產階級來做領導。可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根本是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關係很密切，大部分他們自身是地主，所以不能徹底地反對封建殘餘。加上他們沒有充分的資本，優越的條件，與帝國主義的競爭者對抗，領導一切被壓迫民衆作反帝反封建的能力。即是他沒有完成他自身的任務

的力量。可是另一方面，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數量上雖比農民少，在文化程度上低於各先進國的無產階級。但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已經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及資本的輸入同時輸入，因此喚醒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自覺，而增加了他們的力量。所以他們在五世以來每次的革命中，常英勇地站在先鋒地位，而屢次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國無力的民族資產階級卒竟退出聯合戰線，所以工人階級不得不立于領導的地位。工人因站在領導地位，這個革命所以是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那末，這個革命和民族資產階級來作領導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有什麼不同呢？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必須經過社會革命，方可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合政權底下，可以無須經過社會革命，而合流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然其主要的目標，在於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則彼此皆同。這個運動所以必須以工人為領導的理由就是：民族資產階級既沒有領導的力量，且放棄了他的任務，同時中國的革命既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在世界無產階級確立其領導權的今日，中國無產階級在文化程度雖然比較的低，但是充分地可作這個運動的領導者，而且不可不作領導者。

五、結論

一。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的侵略底政治上法律上的保障，使中國殖民地化的精銳的武器。

二。用和平談判的手段，去哀求帝國主義撤廢領判權，是買辦們送掉民族利益冠冕堂皇的欺騙。

三。要撤廢領判權，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底下，積極進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才能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出境，肅清封建殘餘，統一全國。

“經濟的條件開始把一國的羣衆變成工資勞動者。資本的統治給這種羣衆創造出一互通的地位與互通的利害關係。因此這種羣衆對於資本已經是一個階級，但對牠本身尚不是一個階級。在鬥爭中，這些羣衆一致聯合，就以一階級而本身組織起來了。牠所保護的利益就成為階級利益。但是階級與階級間的鬥爭，便是一種政治的鬥爭”

——哲學之貧困——

偉大的轉換之一年

筱江譯

過去的一年，在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切的戰線上，算是偉大的轉換之一年。這個轉換，在對於都市及農村之資本主義的分子而行的果敢的攻勢這塊旗幟之下，實行過了；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實行。這種攻勢，已經在我國經濟之社會主義的再建築（改造）這個基礎的領域裏，給與了我們幾多的決定的成功，因而牠底一個顯著的特殊性即存於此事之中。

由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說：黨為了在以後即在下一個階段裏，組織轉換，誘致對資本主義的分子之成功的攻勢起見，合目的的利用了所謂勒普（Nep，係 New Economic Policy 底簡稱）的最初的階段上底退却。

列寧在施行勒普的時候，說過如次的話：

“我們現在退却了。但是我們為的是先退却而後疾行飛躍，才這樣做的；是以退却之後再開始執拗的進出之事為篤

件，我們才實現新經濟政策而退却了的”。（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章一〇三頁）。

過去一年底結論，明顯地說明了黨在它底活動上成功的奉行了列寧底這個決定的教示。

如果我們把那對於我們有決定的意義的，關於經濟建設的過去一年底結論，拿出來看，我們大概可以把該戰線上我們底攻勢之成功，即把這一年以內底我們底達成，要約為如次的三個根本的契機：

（一）勞動生產力底領域內之達成。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建設底——即使不是最重大的事實——最重大的事實之一，無疑地是我們在勞動生產性底領域裏完成了決定的轉換之事。這個轉換，在那站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戰線上的勞動階級底數百萬羣衆之創造的發意和勞動的昂揚底擴大之中，顯示出來了。過去一年中我們底第一的而且基礎的達成，即存于以上的事情之中。

羣衆底創造的發意和勞動的昂揚之擴大，是依着三個根本的方針而被促進了的。即：（A）用自己批判的武器，和那緊繩着羣衆底勞動的創意與勞動的活動性之官僚主義相鬥爭的方針，（B）用社會主義的鬥爭方法和那怠惰及普羅列塔利亞的規律之破壞者相鬥爭的方針，（C）利用所謂不斷的活動之組織，和那生產上底惡習與沈滯相戰鬥的方針。其結果，我們在廣大的我國（蘇俄以下同此）底各處，把數百萬勞動羣衆之對於勞動的熱誠和勞動上的召集，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了。這種達成底意義，不能够確

實地測知。為什麼呢？因為只有數百萬羣衆之勞働上的昂揚與其對於勞働的熱誠，才能够保證勞働生產力之逐次的成長；若沒有此，則社會主義之對於資本主義的究極的勝利，是不能够想到的。

“唯有勞働生產性——列寧說——在究極處，對於新社會制度底勝利，算是最重大的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出了一種在農奴制度之下不能發見的勞働生產力。資本主義，因社會主義將要造出更新的更高的勞働生產力的緣故，過去被究極的克服了，而且將來還要被究極的克服吧。”（同書第十八卷二五四頁）。

列寧加於黨的課題，即是如上的。

過去一年的結論，說明了黨一方面決定的克服了橫亘於這方面的許多的困難，他方面又成功的奉行了這個課題。

過去一年中黨底第一個重要的達成，即是如上。

(二)工業建設底領域內之達成。和黨底第一的達成不可分離的擺着它底第二的達成。這即是說，我們在過去的一年中，從根本上有利地解決了重工業之基礎的建設上底蓄積問題，採用了使生產手段之生產向上發展的被促進了的速度，因而創出了使我國轉化爲工業國的前提，過去一年中黨底第二個重要的達成，即是存于以上的事情之中的。

輕工業底問題，不是特別困難的問題，我們已經在幾年以前就把它解決了。重工業底問題，若和輕工業比較起來，便更爲困

難，更為重要了。為什麼更為困難呢？因為重工業必要龐大的投資，而工業後進的許多國家底歷史告訴我們：重工業若沒有龐大的而且長期的借款，便不能成立；為什麼更為重要呢？因為重工業若不發展，我們便不能夠建設一切的工業，不能夠實現任何種類底工業化。無論在過去在現在，我們連任何種類的長期借款或信託都沒有舉行過或舉行着，唯其如此，所以這個問題對於我們現出外觀以上的尖銳。

世界各國底資本家們，以為俄羅斯人恐怕不能夠以其自身之力解決蓄積的問題吧，又俄國將因關於重工業之再建設底問題而破滅，因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即不得不陷於奴隸狀態。這種臆測，不外是由上述的事情出發的。

關於這件事情，過去一年底結論是怎樣告訴我們的呢？過去一年的結論底意義，在於牠把資本家諸君底計算打得粉粉碎碎的事情之中。過去的一年，證明了蘇俄雖然受了公然或陰然的金融封鎖，但是我們却不會變為資本家底奴隸；又證明了因為確定了重工業底基礎底緣故，我們以自身底力量成功的解決了蓄積底問題。這件事情，在現在，雖是勞動階級底最惡的敵人，也不能否定。實際上，向大工業投下的資本，在昨年已達到十六億盧布以上，而其中約十三億盧布被分配到重工業上邊了，今年向大工業投下的資本竟達於三十四億盧布以上，而其中底二十五億盧布以上是被分配到重工業上邊的，即，在昨年大工業底總生產現出了百分之二十三的生長，其時重工業底總生產現出了百分之三〇的

生長，而在今年，大工業底總生產不得不現出百分之三十二的生長，此時重工業底總生產不能不現出百分之四十六的生長。如果我們想到這種事情，大概可以明白重工業上底蓄積問題，對於我們，決不是不能超越的困難吧！又，我們依着重工業之發展的方向而躍進，凌駕乎舊日的速度，藉以將我“由太古傳來的”遲鈍與野蠻拋棄於後方的事情，大概是不會懷疑的了吧！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五年計劃底前提已在過去一年間被達成了的事情；及布爾喬亞的三文文士認為“難以達到的妄想”，即使我右翼的機會主義者（布哈林一派）發生恐怖的，五年計劃底的二案（預想到自然條件之惡劣的場合而作出的案，即是想在五年間達成全計劃之內容的案——譯者），實際上轉化成了第一案（預想到非然之場合而作出的案，即是想在四年間達成全計劃之內容的案——譯者）的事情，還有懷疑底餘地嗎？

“我們知道——列寧說——救濟俄國的東西，既不單是農民經濟之良好的收穫，——只靠這個是不够的，——也不單是供給農民以消費材的輕工業之繁昌，——只靠這個依然是不够的，——救濟俄國，重工業是必要的。若不救濟重工業，若不圖其復興，我們便連任何產業也不能夠建設。如果沒有重工業，在獨立國家的資格上，我們只好一般的破滅吧。………重工業感着國家底補助金之不足。如果在我們底手頭沒有這樣的補助金，我們雖在文明國家的資格上，——我在這裏就不用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格上那些話了，——

也只有破滅而已”。（同書第十八卷第二章九六頁）。

列寧如何樣嚴密地規定了關於蓄積之問題與重工業之建設的黨底任務？

過去的一年，證明了黨是成功的處理了這個課題，而且決定的克服了這方面底一切的各種的困難。

自然，這件事情並不是表示今後的工業便不會遭遇深刻的困難底意思。重工業底建設這個課題，不僅是依據蓄積底問題，它也依據於幹部底問題，即依據於：（A）使那為蘇維埃所薰陶的幾萬的技術家及專門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B）由勞動階級裏邊完成新的赤色技術家及赤色專門家底問題，如果可以把蓄積問題看做已經被根本解決了的問題，那末，幹部底問題就是跟着等候解決的問題了。而且幹部底問題，在現在：即在工業之技術改造期裏，是社會主義建設之決定的問題。

“重要而我們却沒有具備的東西——列寧說——就是文化⁹和處理事務的能力。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勒普對我們保證着建設社會經濟之基礎底可能性。問題只是在普羅列塔利亞與其前衛底文化上底力量之中”。（列寧選集第八卷六八頁）

在這裡成為問題的，第一是“文化上底力量”之問題，是關於——一般的說來，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必要的，部分的說來，工業底處理上所必需的——幹部的問題之事，十分的明顯。

但是由這件事情，又不能不說：雖然在對於重工業有本質的

意義的蓄積底領域裏，獲得了最重大的達成，但是如果幹部底問題未被解決，則重工業底建設這個問題，不能算是完全地解決了。

因此，黨底任務是用心地去着手幹部底問題，無論如何總要占領着這個要塞的。

過去一年中黨底第二的達成，便是如上。

(三)農村經濟建設底領域內之達成。最後我們就過去一年中黨底第三的達成——這和最初的兩個達成是有機的結合着的——來說一說吧。在這裏成為問題的，即是我國農業之發展上底根本的轉換，詳言之，即是由小規模的而且落後的個人的經營，向大規模的而且先進的集約的農業，向土地之共同耕作，向依據新技術的亞爾特爾（Artel 共働共利的組合）或共同經營，乃至向那用幾百個耕作機及相互扶助的方法而武裝起來的巨人＝蘇維埃經營的大規模農業去的轉換。在這一方面的黨底達成，在於我們在許多的地方，成功的把農民底基礎的羣衆，由發展之舊的資本主義的方向——由此獲得利益的人只是少數的財主＝資本家，大多數的農民不得不在困貧之中呻吟着——向發展之新的社會主義的方向——這一面壓迫財主＝資本家，同時為要使中農及貧農藉新的方法更換武裝，換句話說，為要使他們由貧困甚至於由依靠富農的奴隸狀態向土地之同志的集約的耕作這個壘壘的大道上逃避起見，用新的武器即用耕作機及農具把他們武裝起來——轉變了的事情之中。換句話說，在這一方面的黨底達成，在於不拘非常的困難，即不拘自富農及僧侶以至於商人及右翼的機會主義者之一

切的而且各種的朦朧的勢力所試行的絕望的反抗，我們成功的在農民自身之中組織了這個基礎的轉換，把貧農及中農之廣大的羣衆牽引來了的事情之中。

現在我們舉出若干的數字，以資證明吧：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大規模農業底播種地為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為六百萬甄特勒以上（三千六百萬普德 Pood 以上），集團耕作底播作地為一百三十九萬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約為三百五十萬甄特勒（二千萬普德以上）。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大規模農業底播種地為一百八十一萬六千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約為八百萬甄特勒（約四千七百萬普德），集團耕作底播作地為四百二十六萬一千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達於一千三百萬甄特勒（約七千八百萬普德）。在將來的一九三〇年，蘇維埃大規模農業底播種地，據調查底數字，不能不達於三百二十八萬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不能不達於一千八百萬甄特勒（一億一千萬普德），集約耕作底播種地，不能不達於一千五百萬海克塔，商品穀物底生產不能不達於四千九百萬甄特勒（約三億普德）。換句話說，在將來的一九三〇年，蘇維埃大規模農業及集團耕作上底穀物底生產，不能不在四億普德以上，即不能不在全農業底商品穀物之生產底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承認：雖是我國底被社會化了的大工業，也沒有顯出如上所述的暴風雨一般的發展速度，即不能不承認：這種發展速度，在一般的關係上，異于他種發展速度，而成就了

偉大的發展。

我少壯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共同經營的或蘇維埃大規模的農業）有洋洋之前途的事情，又此種農業將作驚異之發展的事情，還有使我們懷疑的餘地嗎？

共同經營建設之領域內底這種未曾有的成功，雖然可以由許多的原因來說明，但是我們至少必須由其中指摘出如次的原由：

未曾有的成功，第一，可以由黨藉着扶植協同組合的社會性把農民底大眾逐次向共同經營底方面牽引，並實施了關於大眾教育的列寧的政策之事來說明。換句話說，這種成功，是可以由黨無論對於那企圖走在運動底前邊而藉條文去規定共同經營之發展的份子（“只顧口頭的左翼”），或對於那企圖使黨後退而附于運動之驥尾的份子（血液循環惡劣的右翼），都遂行了成功的鬥爭之事來說明的。確實如果不曾採取這樣的政策，黨或者不能夠把集團耕作運動轉化為農民自身之真心的大眾的運動也未可知。

“彼得格勒底普羅列塔利亞和彼得格勒守備隊底兵士在他們底手裡握了政權的時候，——列寧說，——他們明瞭地知道了：農村裏底建設將要遇着很大的困難；在那裡不可不再漸次的前進；在那裏要想以指令或法令去實現土地底共同耕作，是無上的傻瓜；及贊成土地之共同耕作的只是少數的意識的份子，多數的農民恐怕不提起這個課題；等等的事情。正因為有這種理由，所以我們把事情只限定於在促進革命底發展上有絕對之必要的事情上邊。這即是說，無論在何

種場合，不把羣衆底發展置之度外而前進，十分忍耐地等到向前的運動，因為此等羣衆自身底經驗，因為他們自身底鬥爭而抬頭的時候為止。”（第十五卷，五〇〇頁）

第二，農村經濟之建設事業上底未曾有的成功，可以由下述的事情來說明，即，蘇維埃政府正確地察知了農民對於新農具新技術的高漲的需要，即蘇維埃政府正確地察知了在土地耕作底舊形態之下農民底狀態全然無法改善，而由於此等事情之察覺，應着機宜，或用借用條件之方式及耕作機隊，駐車場設置之方式，或用土地之共同耕作的組織乃至集團耕作之設置的方式及藉蘇維埃大規模農業之力與農業以全副的援助之方式，組織了對於農民的援助。把向着農民的勤勞大眾示出體系的而且長期的生產的援助之準備與能力在事實上證明的政府，即蘇維埃政府，開始在人類史上現其姿態了。自太古以來對於農具之不足就感覺困惱的農民的勞苦大眾，如果他們左袒集團耕作的運動，則他們不能不要求如上的援助之事，我們果真還沒有看到嗎？又勞働者以前底口號“把面向着農村”今後將藉農民＝集團耕作者底新口號“把面向着都市”來補充的事情，我們果真還能够懷疑嗎？

最後，集團耕作之建設事業上底未曾有的成功，可以由我國底前衛的勞働者自行從事於這種工作的事情來說明。我常想起在我國底基礎的地域上數十人或數百人成為一羣而分散着的勞働者羣。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集團耕作運動之現在的而且具有可能性的一切的宣傳家裏邊，勞働者＝宣傳家算是農民羣衆裏邊底最優秀

的宣傳家子。我們在那顯示集團的大經營對於個人的小經營之優越，尤其是顯示現在目前的蘇維埃大規模農業及集團耕作之優越的明白的例証已經顯著的場合，怎樣還能够懷疑這不是勞働者說服農民之成功呢？

集團耕作建設之領域內底我們底達成，即，據我想來是這裏數年間所達成的工作中底一個最重大的而且最決定的東西的這個達成，即是在如上的基礎之上成長起來的。

對於具有五萬乃至十萬海克塔之地域的大穀物工場之組織底可能性與合目的性之“科學”底反對，已經雲消而霧散了。不但實踐必須由“科學”學習，而且“科學”也必須由實踐學習以證明其完全無誤，實踐即因此推翻了“科學”底反駁。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邊，大穀物工場=巨人，是不會續出的。

但是我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不可忘記了這個“小的”差異。在資本家底手下不買許多的農作地，不支付那不得不在生產上課以老大之支出的絕對地租，不能夠組織大穀物工場。為什麼呢？因為在那裏有對於土地的私有財產制存在着的緣故。但是在我們底手下却是反對的。在我們底手下，既沒有絕對地租存在，又全然沒有土地之買賣存在，因而在發展大穀物經濟上不能不生出許多有利的條件。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底手下沒有對於土地的私有財產制存在的緣故。又在資本家底手下，大穀物經濟是以收受最大限的利潤或至少獲得一種相當於平均利潤的利潤為目的的，若沒有這種利潤，則就一般的說來，資本在着手于穀物經濟

之組織的事情上邊便沒有利益。但是在我們底手下却是反對的，大穀物經濟和國營經濟一樣，在其發展上既不必要最大限的利潤，也不必要平均利潤，牠可以停留于最小限的利潤上邊，也可以不要一切的利潤而成立的。而最後的事情又生出了大穀物經濟之發展上底好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之下，為大穀物經濟計，既沒有被免了稅的特殊的信用存在，又沒有特別的免稅存在，但是在那為支持社會主義機關而樹立起來的蘇維埃制度之下，如此的免稅，在現在是存在着的，在將來大概也是要存在的。這些一切的事情，都被可尊敬的“科學”忘却了。

(A) 農民不會參加集團耕作吧；(B) 以集團耕作之發展為目的而被促進了的速度，恐怕只能喚起羣衆底不滿和勞働階級與農民底背馳吧；(C) 農村裏底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大道，不是集團耕作，而是協同組合；(D) 集團耕作底發展與對於農村裏底資本主義的分子之攻勢，恐怕要造成一個沒有麵包的國家：關於此等事情右翼機會主義者（布哈林一派）底確認，也雲消而霧散了。這即是說，這些一切的事情，都和舊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廢物一樣，崩潰而四散了。

第一，農民已經參加了集團耕作，而且是據多數的村，多數的郡，多數的地域而參加的。

第二，大眾的集團耕作運動，不僅不會使農民與勞働者底結合鬆懈，反而能使它堅強，並與以新的生產的基礎。在現在，假若能在農民底基礎的羣衆之中察出何等重大的不滿，則這與蘇維

埃政府底集團耕作政策沒有關係，而與蘇維埃政府在供給農民以機械或耕作機之點上不能和集團耕作比肩的事情是有關係的。這種情形，雖在盲者也是無容游疑的。

第三，關於農村裏底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大道”的論爭，乃是愛亨瓦爾德或斯列福可夫型的類似乎幼稚的小布爾喬亞自由主義者的斯柯拉(Schole)哲學的論爭。無疑地在大眾的集團耕作運動還未現形的時代，雖然協同組合底低度的形態，即供給的而且販賣的協同組合，算是“大道”，但是等到充做協同組合之高度的形態的這種集團耕作形態出現于舞台的時候，成為發展之“大道”的，便是集團耕作的形態了。明顯地說，作成農村裏底社會主義底發展之大道的東西，乃是由其低度的形態（供給＝販賣的協同組合）以至于較高度的形態（生產＝集團耕作的協同組合）之一切形態的農業的協同組合全被包括的列寧底協同組合計劃。若把集團耕作和協同組合對立起來，便只是櫛梳列寧主義而表示自己之無學的意思罷了。

第四，在現在，雖是盲者也知道：如果拋棄對於農村裏底資本主義分子的攻勢，或者拋棄集團耕作乃至蘇維埃大規模農業運動底發展，那麼，我們在過去一年中所收穫的關於穀物底準備的決定的成功，已經被蓄積在國家底手中的數千萬的穀物底貯蓄，恐怕都不能夠獲得了吧。加之，我們能够確信地說：我們因為大規模農業運動底發展之賜或許能夠究極的充實我們底軀體吧，又受它底賜我們已經逃脫了穀物的危機。又若集團耕作或蘇維埃大

規模農業底發展依着被促進了的速度而進展，那麼，我們不須數年，即使不能變為世界上穀物最豐潤的國家，也必能算做其中底一個。這件事情，無論以何事為根據也是不能游疑的。

那麼，在現在的集團耕作運動上，我們最初所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我們最初所看到的，然由現在的集團耕作運動看來却是決定的東西，即是農民不像以前那樣成立個個的團體，竟至舉多數的村，多數的郡，多數的地域乃至多數的地方，而參加集團耕作的事情。這件事情，即是表示中農參加集團耕作的意思。成為過去一年中蘇維埃政府之最重要的達成的，農業發展上底這種基礎的轉換之根據，即不外存在於上述的事情之中。

相信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上勞働階級沒有能力使農民底基礎的羣衆追隨自己之杜羅斯基主義底孟雪維克的觀念，在現在，也被破壞粉碎了。在現在，雖是盲者也知道中農已經轉向着集團耕作底方面了。在現在，一切的人都明白地知道：工業及農業五年計畫，是社會主義建設上底五年計劃；又不相信我國底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的人們，沒有歡迎我們底五年計劃底權利。

夢想蘇俄底資本主義之復興——“私有財產制這個神聖的法律”底復興——的全世界底資本家庭最後的希望，在現在，也被打壞而變為水泡了。他們認為可以為資本主義建築基礎的農民，陸續地投棄了“私有財產制”這塊榮譽的印旗，而向集產主義底方面，向社會主義方面移行着。對於資本主義之復興的最後的希望，完全被打壞了。

尤其是想舉起舊世界底全勢力對那取攻勢的社會主義抗衡的我國底資本主義分子之絕望的企圖，即想使階級鬥爭尖銳化的企圖，可以由以上的事情明瞭地說明。資本是不願向社會主義“延續”的。

又，最近資本底寵信的看門狗斯託爾威耶，格生，米留可夫，凱林斯基，但，亞布拉莫衛洪之類所引起的對布爾扎維克的充滿憎惡的鬥爭，也不能不藉以上的事情來說明。對於資本主義之復興的最後的希望正在消散的說法，豈是無稽之談嗎？

階級的對立者之此種狂人似的忿怒及資本底忠僕之此種狂暴的鬥爭，所能證明的事情，不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底最困難的戰線上事實上已經把握了決定的勝利之事，是什麼呢？

“只有對農民把共同的，集約的，同志的而且亞爾特爾的土地耕作底優越，成功的用事實說明了的時候，即只有在藉同志的亞爾特爾的經營成功的援助了農民的場合，只有在如此的時候，——列寧說——掌握了國家權力的勞働階級，能够把它底正確藉事實向農民證明，才能够永久地而且如實地牽引數百萬的農民大衆。”（全集第十六卷三九二頁）

關於把數百萬的農民向勞働階級底方面牽引的方法之問題，及關於使農民向集團耕作建設底方面移行的方法之問題，同志列寧是如上地提起的。

“中農——列寧說——恐怕只有我們減輕了他們底生活底經濟條件，而且改善了它的場合，才能夠變為我們底朋友

吧。如果明天我們能够給與他們十萬架優良耕作機及石油精，並派遣技師，（你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情在現在全是一個空想），中農馬上會說：“我是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要想辦到這件事，我們最初必須征服國際布爾喬亞，使他們供給我們以耕作機，或者必須提高我們底生產力一直到我們自己能够供給耕作機為止。像這樣的，問題才算是正確地被提起了。”（全集第十六卷，一五三頁）。

列寧，關於中農底技術的武裝更換的方法之問題，及關於把他們向共產主義底方面牽引的方法之問題，如上地提出了。

過去的一年，明示着黨曾成功的處理了這個課題。我們到年底春天可以有六萬以上的耕作機，到來年底末尾可以有十萬以上的耕作機，又在兩年以後可以有二十五萬以上的耕作機之事，是人所熟知的。數年以前被看做“空想”的東西，在現在我們能够加利息地轉化為現實了。中農向“共產主義”底方面轉向了底原因，即存於以上的事情之中。

黨底第三之建成，即在如上的狀態之下。

過去一年間黨所成就的基礎的達成，即是如上的。

我們將一面放棄我們底宿命的而且“人種的”野蠻，一面向着工業化即向着社會主義突進。我國將變成工業的國家，汽車的國家，耕作機的國家。而且等到我們要把蘇俄放在汽車上邊，把農民放在耕作機上邊的時候，我們將使那以“文明”自詡的可尊敬的資本家諸君，去試一試他們追隨我們的事情，究竟是可能呢

? 不可能呢？而且到那時候，我們更可以看出如何樣的國家將被規定為落後的國家，如何樣的國家將被規定為進步的國家。如此便是我們底結論。

——此文係 Stalin 所作，原文見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布拉烏達”第二五九號——

編者附：——因鐵般事實的證明，布哈林現已完全承認其一切政治的和策略的問題底錯誤。（見1929年一月二十六日“真理報”所載）詳細請讀者參看下期之“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一文。

‘凡在社會主義革命上，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那跨着體系的生產及生產物的分配而從新組織起來的關係中，那非常複雜而微妙的羅網，從事造成一種積極的建設的工作。……對於被抑壓的勞動羣衆，務使他有積極的參加新社會的自由建設的機會，像這種新國家形態——蘇維埃的創成，我們還只解決了困難工作的一部分。主要的困難，就在經濟領域的上面。如提高勞動生產力，如嚴格的建立生產及分配的統一計算及統制，總之，就是現實的把生產社會主義化。’

國際主義底前驅

Stekloff 著 江峙譯

自從古代大帝國成立以來，全人類底統一和聯合的理想，永沒有完全消滅過，國際羅馬帝國，掩有當時所知道的舊世界，給與這種理想以新的刺激，這種思想，當附在中世紀的加特力教上時，受了長足的進展。雖然，後來人類全世界的聯合理想，被經過不斷戰爭的進程而形成的民族國家所埋沒，國際主義的觀念却繼續在哲學家和各種教派的學說中活躍着。真的，統治階級們，不管他們自身間如何地互相爭鬥，却不斷實施着一種國際聯合的形式，來鎮壓被壓迫民衆的革命運動。

我們總還記得中古農民和手工人的叛亂吧，為反對這件事，當時的一切統治身分的人（Ruling caste）都武裝起來。在羣衆叛亂的面前，統治階級立即忘去他們民族的和教派的論爭，站在共同的利益上來反對叛變了。反對貧苦的民衆底聯合戰線是被皇帝，國王，諸侯，貴族及富有的市民一致所形成的。教皇——當時統治

階級的國際領袖——對異端宣佈神聖的戰爭時，各國的武士都參與這種征戰的。十字軍，就這樣的對十四世紀在諾瓦拉底獨爾西西諾所領導下北意大利底農民宣戰；而爲反對黑塞教派（Hussites），十字軍的出征也不下五次。在德意志，當農民戰爭（1525年）時，統治階級也表示出同樣的聯合。當反對在 Communism 底旗幟下而作戰的貧農和城市手工業者這些叛徒們的鬥爭時，天主教和新教徒也聯合起來了，國王和諸侯，貴族和富有市民，羅馬教堂的主教和改革派領袖馬丁路德都聯合起來了。因遇到統治階級方面這種一致聯合的戰線，被壓迫者第一次普遍反叛的嘗試，卒歸毫沒結果地消滅。雖然即使在這種幼稚的時期，被壓迫者國際聯合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而且，一種普及世界的運動應當是超越國界的需要，也認識出來了。太波派（Taborites,）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國際聯合觀念的復活，是與十八世紀末法蘭西大革命的時代相銜接的。爲暴露一切歐洲國家封建社會反動勢力野蠻的攻擊，法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針對着反動聯盟，（他們是歐洲一切地主和專制主義反革命的聯合）而組織新社會革命勢力的團結。因此“革命宣傳”的觀念活躍起來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推翻了法國的專制主義之後，對全世界宣佈了“對皇宮戰爭，對廬舍和平”的口號，號召歐洲一切有生氣的勢力，來援助自由的法蘭西，而推倒各地的暴君。

可是，各民族革命聯合的觀念，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是不

能維持久遠的。因為一方面，資本主義，由於創造世界市場，摧毀國家間的藩籬，開闢傳播國際精神的道路；另一方面，同是這個資本主義，與創造世界市場這種事實，因爭奪市場而起的國際間的衝突和戰爭又增強各國家的排外性。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把全地球一切國家吸引一起，而同時却以增強傳統的國民敵愾，和系統的使各種民族互相衝突，把自己創造出來的成果破壞了。這就是普遍的友愛和世界的和平理想，所以不能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緣故。在資產階級國家，世界經濟的衝突與大眾對大眾戰爭這種對立的潮流迅速地發展了。

無論如何，國際博愛的觀念，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中獲得了牠的支助者和活動的戰士。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由資產階級社會的發達所形成的。他被一切自己的利益所逼迫，趨使他們為建築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而鬥爭。

社會主義是國際的，這也正和資本主義一樣。可是，資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却不斷地被國家資本主義互相競爭所破壞，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國際主義，却為一切工人的利益——不問他們的住所和民族性——休戚相關的活動的聯合所營養與不斷地增強。工人的地位，在牠的本質上，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相一致的。當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斷地互相衝突時，普羅列塔利亞的利益，却互相一致。這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日常鬥爭中，所認識的。例如，他們要求增高工資，縮短時間，和別種保護勞工的法律，却不斷地碰到各國資本家間競爭所防礙。在任何國家中，工資

增加或勞動時間的縮短，往往被別的沒有獲得這種改革的國家底競爭，弄得異常困難，以至幾不可能。並且，當工人為改善他們的地位，而同盟罷工時，先進國的資本家，往往會從生活程度較低的國家中輸入工人以圖補救。這一切事情都使工人們相信他們利害的一致，以及當為改善他們的情形而鬥爭時，共同行動是必要的。

第二，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為站在社會階梯中最下層的一個階級，對於統治階級，輕蔑與無理地強施於被壓迫民衆的暴行有很敏活的感覺，因為這種緣故他們最活躍反對這種侮辱與錯誤的事情。到某一種程度，資本家社會，看出沒有國際組織的力量，沒有弱小國家被強國所壓迫，是不能繼續自身存在了。一當普羅列塔利亞特有了階級意識，牠就開始勇烈的保護，開始對於民族的壓迫，和民族權利的不平等，作鬥爭了。這就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國際主義潮流所由出的第二個根源。

第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週期發生的戰爭底衝動，對於勞動階級加以特別猛烈的打擊，戰爭費用重大的擔負，背鄉離井的離開家庭而轉到營房和戰壕的生活，以及因戰爭而起的巨大物質的損失，失業，飢餓，與貧窮，等等——這一切事情，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中，引起了一種抵抗。這種抵抗，最初是不很自覺的，但到以後漸漸的變成自覺了，於是開始以工人國際聯合的名義下來抵制戰爭，來作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了。

最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國際主義是和牠的社會主義的烟斯

批里純密切地連貫的。因資本主義國家不可分解的經濟的政治的連環性，社會革命，除非在牠的開端，就包含了（即使不是一切國家）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能成功的。因為這種理由，所以一當工人覺悟到他們的解放，沒有社會主義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重行改造起來，是不能有希望的。從那時候起，他們就立刻採取了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為解放而共同作戰作為他們的口號。從這時候起普羅列塔利亞特本能的國際主義就變成了一種意識的國際主義了

在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中，馬克思和恩格思，敘述在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影響下當時生活的國際化。我引了精彩的與有活力的幾段：

“因世界市場的開拓，資產階級把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染上了世界的色彩。在反動的失望中，牠已經把產業的國家基礎剝奪去了。舊式的國民底產業，有許多是已經被毀壞的，另外許多也一天天地走入了毀滅的途中。他們為新產業排擠，而新產業的引入，也成為一切文明國家的生死關頭：這種產業不再倚靠本國的原料，現在牠是從最偏僻的地方也把原料吸收來了；這種產業的生產品底消費者，也不但在工廠所在國度中，而是全球各處的人民。替代本國產業出品所能滿足的舊慾望，新的慾望發生了來，這種慾望只能以遼遠的與生疏的地區的產品才能够滿足的。舊日地方的與國民的自給自足和孤立，是被全世界交通囊括一切國家的互相依恃底體系所代替了。我們在知識產品中，也和物質上的一

樣，可以看出這種事情來。每一國家的知識產品，如今是大家的公共財產。國家的排外和地方主義，也幾乎已成為不可能。從多樣的民族的和地域的文學中，世界的文學產生出來。

“依於生產手段迅速地促進，和交通機關巨大地增便，資產階級把一切國家，即使最野蠻的，也拖入了文明的軌道中。廉價的商品，構成重擊，攻下了中國的萬里長城，而約束排外的野蠻人中之最頑強者，來屈膝投降。牠強使一切國家，在毀滅的苦痛之下，採取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牠逼迫他們接受所謂文明，把自身變成了資產階級。簡言之，牠以牠自己的模型，來創造世界。”

無論如何，如宣言中所指示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發達的。他在和資產階級鬥爭中，經過了發展底各種階段。最初這種鬥爭純粹是個人的；後來，變成了地域的；再變成國家的；最後，牠採取了一種國際的性質。

“普羅列塔利亞特經過各種發展的階段。牠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牠的出世以來就開始的。

“開始，工人個別地鬥爭，於是，在一個工廠中的工人，採取共同行動；於是，全地域的某種產業工人，聯合起來，對付剝削他們的某一特別的有產者。

“在這種階段上，工人是一分裂的羣衆，分散於全國，而被互相間的競爭所切斷。在他們間發生的這種結合，並不是他們自己要求聯合的傾向的成果，倒是由資產階級聯合而來的。資產階

級，爲了他們自己政治之目的，必須推動全體普羅列塔利亞特運行，到現在，他們還不時幹這套把戲，……

“可是當產業發達起來，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只在數量上增加；他們團結成大量的羣衆；他們的力量增加，他們自己更自覺到這種力量了。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中，利益和地位，更加平等化起來。因爲機器不斷地把各種手藝間的差異消滅，把工資幾乎在任何地方，都低減到同樣的水準。因有產者他們自己間互相競爭，與跟着來的商業恐慌等等的結果，工人的工銀，日甚一日地搖動着。機器不斷加速的改良，使他們的生計，愈益艱難，日甚一日地，個別工人和個別有產者間的衝突漸漸帶着階級衝突之性質。因此，工人開始爲反對有產者而聯合起來，加以保持工資率，加緊了他們的密接。他們知道經久的結合，當任何鬥爭變成尖銳時，是會給他們以幫助的。無論何處，鬥爭都是採取叛亂的形式的。

“每次的鬥爭，工人是勝利的，但是他們的勝利，不過是轉眼的曇花。他們鬥爭真正的成果，並不是他們直接的勝利，倒是他們自己不斷增進的聯合。聯合由大產業所引起的交通機關的改善而被促進，把各地工人更密接的結合起來。集中多樣的而同時又是清一色的地城鬥爭，爲一個國民的鬥爭，一個階級鬥爭，如今是成爲最重要的事了。但是，一切的階級鬥爭，是政治的鬥爭。中古的市民，他們最好的交通機關，只是崎嶇的道路，所以要經過幾世紀，才能獲得統一。謝謝現代的鐵路，今日的普羅列塔利亞，能於幾年之內，就把力量團結起來了。

“把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組織，來構成一個階級，構成一個政黨，是不斷地被工人自身間的競爭所瓦解的。可是，牠却不斷地被改良，成為更強健，更堅固與更有力的……”

“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舊社會所流行的社會情形是一點也不會遺留着的……現代的產業勞動，現代資本的奴役（這是在英國也如在法國，美國也如在德國，全是一樣的）已經把工人的民族性洗滌淨了。

“在形式上，雖然不是在實質上，普羅列塔利亞特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原本是國家的。自然，在無論那國，普羅列塔利亞特，總是首先是和牠本國的資產階級算賬的。

“工人無祖國，任何人也不能夠從他們那裏拿掉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當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當自由貿易更變成普遍，當世界市場的面積與重要性更加擴張，當工場的情形與其結果的生活條件更變成一致，於是國家的區別和差異，愈益趨向於消滅了。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統治，將要使這種區別和差異，更完全消滅。一致行動（至少在文明的國家）是工人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個人剝削個人的事情消滅，一國剝削別個國家的事，也跟着消滅。

“在一國內階級對立的消滅，會把國家間的互相敵視，也要消滅的”

這樣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把階級戰爭以及爲普羅列塔利亞國際主義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社會所產生的條件下底自然產物，無可非議的證示出來了。

資產階級社會問題的研究者，也同樣地看到這種事實。譬如德國保守的作家，魯道夫梅依爾（Rudolf Meyer），“第四身分爲解放的鬥爭”這本名著的作者，指示出國際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而出現的。他寫着：

“自由主義是國際的。現代世界經濟的因子，是國際的，尤其是流動資本。我已經說到過‘黃金的國際’（Golden International）——大量資本國際的聯合。這種世界資本，是不知道有國界的，幾乎在任何國中以同一的規律統治着勞動。除了勞動到處表現同一的反抗外，我們又怎能希望別的結果呢？

“國際是在一切實行自由貿易的文明國家，工銀階級共通的利益與要求之表現。這是社會民主擴伸到各國的組織。

“祇要國際的先提隨處存在着，那就同樣的不滿與同樣的渴望事情的改善在第四身分中證明出來，給與這種運動以一定方向的天才人物是必要的。這個人在適當的時期出現了。他的名字就是加爾馬克思（Karl Marx）。”

再比利時的自由經濟學者愛米爾賽拉弗拉依（Emile De Lavele）在“今日的社會主義”上寫道：

“國際主義，是各國正在進行着融化的偉大進程之自然結果。國家變成愈益類似起來，而他們互相的關係，也愈益地密切

了。同一的經濟和宗教的問題，同一的商業和工業的恐慌，同一的階級對立，同一的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鬥爭，在一切文明的國度中發生，無論他們的政府是民主國，是君主國，國家的休戚相關，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了。尤其在經濟的事情中，牠是成為異常真實，即使純粹地方的事變，也能在全球發生了遠大的影響，………因各個國家趨向於成為一個家族，社會活動的一切形態，也必須採取國際的性質。”

還有維納崇巴德（Werner Sombart）急進派的社會學者，資產階級學者中了解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本質之最高明的，指示出“社會主義運動，有一種趨向於全部統一決定的趨勢。”並且，他認識到，社會主義運動的集中潮流，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致性中發生出來的，也是由單一的錯綜原因中發生出來的，所以社會主義願望着形態的一致。”這種現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致性表現於國際主義中。“國際主義的精神是什麼呢？”崇巴德發問而自己回答道：

“第一點，牠是公共利益的表現，………因為資本主義，在一切文明國家中，都佔着勢力的，而普羅列塔利亞特，處處都被迫着去反抗資本，這是很自然的了，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應當於共同鬥爭中，互相幫助。他們互相報告各自的經驗；向各國的政府提出同樣的要求，關於一切工人有同一影響的問題，（如工人的賠償和保護條例）在同盟罷工時互以金錢接濟，來把這件事做到了。國際主義這種特別形象，普羅列塔利亞運動，是和別的

許多運動，從那些上自數千萬的科學會議，下至巴色爾（Basle）國際勞工局及羅馬國際農會，都互相共通的。

“可是，勞工運動的國際主義，却有很特別的東西存在。牠是不僅依靠理智的；牠也求助於心靈。因此社會主義就成為熱情的了，因為他是代表一個高尚的理想，代表一人類博愛的觀念。一個社會主義會議的訪向者，不能不立刻就被感動因牠暗示給他千千萬萬的人們在握手。……他們喜愛的歌，是法國的“國際歌”……在歌聲的「同律」中，藏有深長的意義，牠是頭可斷志不可奪的表現……普羅列塔利亞特歌唱着的歌，是戰爭之歌，充滿了對於如今的國家的憤恨和激怒的。簡言之，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國際主義，是反國家的……而且在這點上，也是牠和普通資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大大不同的地方。

“牠在這點上，是反國家的，牠反對一切偏狹國家主義，侵略主義，帝國主義名義下的一切東西——反對任何國家的開疆拓土，任何國家的驕傲，任何使國家間流血的嘗試，任何的殖民政策，——以及這一切的原因和結果，——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人民要求的是和平。”

這種密切的有機聯繫，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間，另一方面，普羅列塔利亞的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間，在我們今日，已經成為非常明顯，即使在通俗的著作中，討論這種問題，也看作無可非議而自明的事實了。例如在亞希先柯（Yoshchenko）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小冊子中，說道：

“社會主義，不論從牠所由生的基礎而說，還是從牠希圖奮鬥的目的而說，是被內在的、必然的系帶，與國際主義相連接的（依普世聯合和人類國際的組織的理想底意義說的）。

“這種系帶必然而特別地倚恃於現存的社會的經濟生活所採取的形態的。產業和商業，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國家特質，世界經濟，已建立起來了。從經濟生活的統一，一種不能不使社會主義帶國際性質底結果，伴隨着起來：第一，我們有了一切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利益的共通點，從那兒發出了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聯合活動和國際統一底必要的觀念。第二，我們有一個經濟關係的統一，這個統一，是以組織的統一為前提的。

“從經濟的觀點，社會主義組織的表徵形式，是經濟關係的統一。代替現在的生產體系，——沒有秩序，計劃，和方法，完全服屬於機遇，競爭和利益的競爭——社會主義，將要創造出秩序和穩定，那時生產的工程將作為統一的經濟，被掌握於全社會的手中，牠將為中央權力所支配……辦理這種集產化的最便的東西，只能是國家。雖然即使一個孤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自身並不能得到經濟生活的完全有秩序和調和。在這種情形中，在各國間的競爭和經濟鬥爭，還依然繼續下去的，而這種競爭，不斷地會擾亂經濟關係的內在的調和，因為在人類今日生活條件之下，一個國家，經濟的孤立而獨立，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一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要存在於依個人主義體系組成的國家間，是不能想像的……

“在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國家權力支配着的現實，有一種不能超越的矛盾存在着。社會主義是和現存的國家，和依軍隊力量的組織而建立於一個階級統治別階級的國家相衝突的。對於這個統治，社會主義希望替代以一個無階級的國家，人們在這種國家中，將無須以強力保持少數對大家的統治壓迫。……但是，除開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民族國家的實際存在相矛盾而外，這是必須指出的，現今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和把人類分為許多權力的國家相衝突的。勝利照例只給與特權階級的人們，——軍隊的包辦者，在戰勝後獲得無數獎賞的人們和那些在被征服國家中以直接奪取土地而致富的人們底利益。（即使這個也有許多時候是虛構的。）戰勝國的人民，為取得少量的錢財，費去了千千萬萬，一一並不是為他們自己，只是為神恩特選者的少數人罷了。……

“因為上舉的理由，社會思潮，從其開始，當前的問題，就是國際問題。”

“經濟生活的國有化是資本家的自由主義所堅決反對的，現在這種國有化成爲一種不容否認的事實了。世界不獨是不能夠回轉到自由競爭的地步，並且也不能夠回轉到托辣斯辛迭加或別項經濟奇觀的地位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在將來誰當管理國有化的生產——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還是勝利的工人之國家。換句話說，一羣勝利的國際暴徒依據國際聯盟的名義藉助於一種『國際的』陸軍和一種『國際的』海軍，輪流掠奪，或以少許麵包給予貧民，但是無論在何處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總是加上鎖鍊子，藉以達到維持他們自己勢力的唯一目的，而使全體勞動人類都在這種人的下面做奴隸和日工勞動者呢；還是歐洲以及世界各處大多數文明國家的工人，把敗壞的和零落的世界經濟握入自己的手中，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保證這種經濟回復原狀呢？”

——New Manifesto of C.I.——

辯証法淺釋

沈平譯

辯証法最初的意義是用証緝的方法，證明某事實的真確，或否認某事實。而這論辯並不限於幾個人之間的互相討論，只是收集許多意見放在一起來比較研究，尋找他們中間的矛盾，而求出結論的意思。現在一般人所知道的辯證法，就是著名的自然哲學者黑格爾的辯証法。黑格爾認為在絕對的繼續的發展中，有一定的法則存在。他關於這個法則說道：“一種思想。一定會產生別種和他正相反的思想，而這兩個矛盾的思想，又必定綜合成更高級的思想。”他把這法則發展成正——反——合三個形式，而且他說：“用這個法則，去進行思想，就是哲學的研究法。”（方法論）這就是黑格爾辯証法的精髓。現在把他更詳細的敘述在下面。假說有一思想A，A¹是正面的（正題目，肯定。）可是在這萬物都在流轉的世界，過程的世界裏，這A並不純粹是A，A同時是非A，就是B。所以A同時就包含着他正反對的思想B。這個被包含的

思想B，當A未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仍然是被包含着，可是到了這個階段，就成為顯現形態，那末，A就和他的反對思想B對立。B是反的，否定的。A與B是矛盾的。這個矛盾，必然要喚起他們的對立鬥爭。這個對立鬥爭的過程，否定了思想B。結果既不是A，也不是B，是把這兩者的一部份，結合起來，綜合為比這兩者更高一級的思想C，C就是合(肯定。)思想像這樣從低級進化為高級，漸漸的前進，正反合的發展形式就叫做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的形式，就是“肯定——否定——肯定”的形式。更通俗一點說，就是把正反合的過程，用擬人化的方法說明，那末對於某一個問題，甲發表一種意見，這就是正面的，肯定的。對於這問題，乙發表一種和甲反對的意見，這就是反面的，否定的。於是因為兩人意見的矛盾，喚起了鬥爭(理論的對立鬥爭。)在這理論鬥爭的過程，乙的意見也被否定了。結果，把甲乙意見的一部份結合起來，一部份廢棄，產生出第三個意見，這個意見，既不是甲的意見，也不是乙的意見。這是合，而且是肯定。這個結論比甲的意見要高一層，比乙的意見也高一層。這鬥爭的過程，把甲和乙的意見，全都提高了。這個過程也叫做“止揚”(Aufheben)。這“正——反——合”就是“肯定——否定——肯定”的思想發展形式，就是辯証法的發展。黑格爾的辯証法論，就是用正——反——合的形式發展思想，不但是含有論理學的意味的方法論，而且是含有哲學意味的方法論。黑格爾是唯心論者，他以為觀念是絕對的，物質不過是觀念的產

物。我們也許可以說，他的辯証法是唯心辯証法。可是黑格爾的辯証法，却是無產階級的演繹觀，歷史觀的基礎，思考上最偉大的方法，所以他必定要成為唯物辯証法。而這唯物辯証法是經過佛爾巴哈，由馬克思成立的。由唯心辯証法，向唯物辯証法的止揚，仍然是用辯証法的發展——正，反，合——形式。黑格爾的辯証法，是正的，肯定的。佛爾巴哈的唯物論——思惟是從實在產生的，不是實在從思惟產生。實在是主，思惟是客。除了人類和自然以外，什麼也沒有。沒有比人類和自然更高級的東西存在。人類和自然是主，思惟是客，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對於黑格爾的辯証法是反的，是否定的。佛爾巴哈急于要否定黑格爾的學說，不但否定了唯心論，也否定了辯証法。在這正反的對立過程中，佛爾巴哈也被否定了。從黑格爾棄掉他的唯心論，採取他的辯証法，從佛爾巴哈棄掉他的反辯証法，採取他的唯物論；綜合成爲第三的高級概念，就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証法。這馬克思的辯証法是合，是肯定。這個唯物辯証法，是黑格爾的辯証法的止揚，和黑格爾的辯証法不同。因他是把唯物論和辯証法統一起來的東西。馬克思說：黑格爾以爲，觀念的獨立主體，是現實界的創造者，現實界不過是這主體的外部現象而已；而我們的意思，正反乎是，觀念不過是移植於人類頭腦中，反映於人類頭腦中的物質而已。黑格爾的辯証法，是把頭向下的倒立着。我們把這神祕的錯誤，暴露出來，尋求合理的真實，把他的辯証法倒轉過來。”昂格思說：“我和馬克思的唯一使命，就是把意識的辯証法從‘唯

心論及黑格爾哲學的東倒西歪，中解放出來，而移置於唯物的自然觀上面——自然是辯証法的保證者。最近自然科學的進步，對於自然能確實證明辯証法的正確的事實，供給了非常豐富的材料。自然證明了一切現象都是辯証法的存續，不是形而上學的。”有人從哲學及方法論兩個觀念，把黑格爾的辯証法，分為辯証法的唯心論及唯心辯証法。因為要和前面這兩個相對照，把馬克思的辯証法，也分為辯証法的唯物論及唯物辯証法。這個分法是不很重要的。因為辯証法的唯物論及唯物辯証法是不可分離的東西。而且辯証法的唯物論不但和唯心論立於反對的地位，和從前的機械的唯物論——以為世界是由於一種的因果關係，而連續的運動着的唯物論——也有區別。牠是新唯物論，牠以為世界是因相互關係，及以矛盾為動力，以鬥爭為要素的運動，才發展的。

現在把牠更詳細的敘述在下面：

(一) 辯証法的唯物論，是和以精神為主，物質為客，物質為精神的產物的唯心論相反對的。牠以為精神是物質的產物，物質是主，精神是客。昂格爾說：“假若我們在這裏提出什麼是思維，什麼是運動”這些是從那裡來的等問題，我們就知道，這些都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的頭腦又是自然的產物。那末頭腦的產物，就不是和自然的一般關係與聯絡，相矛盾。却是適應這關係聯絡和矛盾的。這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人類是從別的生物進化成的一種動物。精神不過是從人類這動物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東西。

(二)昂格爾說：“世界底統一不是存在於實在，不，因為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的，辛勤的發展，證明了牠是存在於物質性。——無論什麼時候運動都是物質的實在形式。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不運動的物質，也沒有離開了物質的運動。這種事實不但沒有，並且不可能。”黑格爾的辯証法中說：所有的觀念都不是固定的，是不斷的發展，是變化的過程。就是“有”，這個觀念，也可以看出他的發展和變化，牠並不是固定的，牠包含着“無”這個觀念。而再綜合為“成”這個觀念。辯証法的唯物論，就是用這樣的觀察方法，去觀察一切的事物。就是說，不是把事情看做靜的，是看做動的，不是看做固定的，是看做運動的。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裏一切事物都是不斷的變化着。一切的事物都不過是過程的存在。所以要正確的觀察事實，不得不着眼在他的發生，發展和滅亡上，就是觀察牠的過程。

(三)把一切事物都看為運動的過程，變化的過程，那末，各各事物就不能分開來觀察，萬物彼此都有相連的關係。不是像機械的唯物論所說的，因和果只是一方面連續着，是其他各方面也有相互的作用。“世界是一個無限的現實的總體，其中，全體的各部分，在過程中，都有恆久不滅的相互作用”辯証法的唯物論，把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的現象都看為關連的，整個的。昂格爾說：“世界不是已經完成的是過程的集合體的表現。這過程的集合體，在頭腦中所產生的思惟或概念是不斷的變化着。這樣偉大的思想，從黑格爾時代，才成為一般的意識。“在辯証法的哲學

上沒有永久被否定的東西，沒有絕對的，更沒有神聖的東西。辯証法的哲學能够在一切之上，一切之中，看出牠的不可避免的殞落。除了在不斷的發生與滅亡的過程，除了從低級向高級無限的進化之外，什麼東西也不能成立。就是辯證法自身，也不過是思惟在頭腦中，某一過程的反映。”

(四)像上面所說的，若是把所有的事物，都看爲變化和運動的過程，那末運動或變化的動力是什麼呢？這動力就是在事物中所包含着的矛盾。所謂矛盾，就是力和力的對立。這矛盾就是發生鬥爭的動力（力和力的衝擊）。因爲鬥爭而把事物發展到更高級的階段，因此解決了其中的矛盾。這就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矛盾——鬥爭——發展是依着正，反，合即肯定——否定的否定——肯定而發展的。所以矛盾是鬥爭的母親，而鬥爭又是發展的母親。我們只要觀察繼續着運動的物體，就知道，於同一瞬間，這物體是在某處，同時又不是在某處。把運動着的物體，對照着觀察的時候，除了用“肯定——否定的否定——肯定”的形式以外，沒有其他的形式，能够說明這物體。假設現在有「繼續冷卻的水」，看起來，也不是液體，也不是固體。他是在‘從液體向固體的過程中’這是‘運動着的，變化着的水’。冷卻的程度漸漸的增大，到了零度以下的時候，水就突然變成冰了。

(五)像這冰的例子，量的變化到了某種程度就發生質的變化，這種思考的方法，也是辯証法的要素之一。從古以來，就有人說：「自然不是飛躍的」，可是量的變化，到了一定程度，所發生

的質的變化，就可以看做是飛躍的現象。社會革命是飛躍的社會變化，是社會的突然變化。

(六)辯証法是進化學說。可是進化論是在「外的主因」——自然淘汰——中，求進步的動力。而辯証法是在自身的內部的主體中，尋求進化的動力。就是於內在的矛盾和鬥爭中，尋求這動力，也就是在自己的運動中，尋求這動力。前者以為進化是漸進的，而後者以為進化是突變飛躍的。

以上是馬克思辯證法的要領。把辯証法的唯物論適用於社會的構成及其變革，在歷史上就成了有名的唯物史觀。我們現在把辯証法的應用方法，略述在下面：

世界就是自然和人類，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份。所以社會的基礎及社會變革的動力，都在於自然的要素即生產力。一個社會的構成，都是以當時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即經濟的構造為基礎。在這基礎上面，再建設適當的政治，法律，宗教等的上層建設。所以生產力是因，上層建設是果。兩者的相互作用，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在某一發展階段中，和牠的上層建設是矛盾的。於是生產力喚起了矛盾的顯現形態，即鬥爭，而要求社會的變革。歷史上的現象，都是一個同一的事物而有肯定和否定兩方面。生產力也是這樣，生產力打破了封建制度的軀殼，而發展資本家的生產，這資本家的生產，必然的產生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所以生產力對於私有財產制是肯定的。但是同一生產力更發展之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就成為

桎梏。而生產力是非發展不可的。所以生產力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衝突，非剷除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即私有財產制，不能解決這矛盾。只有這樣解決，才能根本的消除了這個矛盾。在這個場合，生產力對於私有財產制是否定的。所以同一的生產力，在某種場合，是私有制的肯定，在他種場合，却是私有制的否定。所以辯証法，是在目前存在的事物——例如私有財產制——的肯定理論中，找出牠自身所包含着的否定理論，牠的變革理論。歷史上的事物沒有絕對善的或惡的。牠同時包含着肯定及否定兩個反對的性質。這就是矛盾。可是這矛盾是運動的母親，變革的動力。矛盾——力的對立——產生鬥爭及運動——力的鬥爭——假設生產沒有這種矛盾的性質，那末，封建的生產，就不能飛躍到資本主義的生產。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面前，既有矛盾，那末這矛盾就產生鬥爭，而鬥爭又促進現在的生產發展到更高度的生產力，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無論階級鬥爭是善是惡，而人類社會必定是因為這矛盾，只因為這矛盾所表現的階級鬥爭，才能進化到更高度的社會。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產生的資本家的領有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是基立于個人的自己的勞動底私有財產的第一否定。然而資本家的生產，因為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又產生了自身的否定。就是否定的否定。這一否定，並不是恢復勞動者的私有財產，不過是造出以資本家時代的成果為基礎的個人所有，是的確的。

世界並不是已經成就的複合體，而是過程的複合體。所以觀察歷史的時候，若是把歷史上的事物，脫離了他的前後關係，只是部分的，抽象的觀察，那末，就不是活的過程，而是死的靜物。所以要觀察事物，必須在牠的相互關係，緣起和滅亡中，即過程中，去觀察。而且必須把事物看做全體中的一部份。其次，我們觀察歷史上事物的時候，有看出牠是怎樣的歷史形態的必要。例如把生產機關，做為資本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態。這就是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歷史的辯証法的理論。最後我們再舉列寧的定義：“辯証法是研究下面各問題的學理：即對立物怎樣能同一呢？（怎麼樣仍然是對立物呢？）在什麼條件之下，對立物才轉化為同一物呢？為什麼人類的悟性，不把對立物看為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把牠看成活的，有條件的，運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呢？”

1929, 12, 28, 北平。

“無產階級與財富是對立的。牠以對立而形成一個全體。……私有財產以私有財產的立場，而強制的要他自身，因而要牠的對立者無產階級存在。這在對立的積極方面，是滿足了自己的欲求的私有財產。反之，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強制的要棄揚他自身，因而棄揚那約束他們的對立者——私有財產。這在對立的消極方面，牠是自身中潛伏了不安，而已經解體或正在解體的私有財產。”

——神聖之家族——

一九二九年第三季的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由七月十六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

E. Varga 著 李餘譯

I. 海牙會議，裁軍的策略及帝國主義

對立的加劇。

- A. 斯巴協定，巴爾福聲明書，及楊格計畫。
- B. 大不列顛政策在海牙會議的意義。
- C. 海牙會議的成果。
- D. 關於賠償銀行性質的爭執。
- E. 帝國主義衝突的加劇及裁軍的欺詐。

I. 海牙會議，裁軍的策略及帝國主義

對立的加劇

在最近數月間所表現的特色，是帝國主義者用着最和平的口號並英美間關於限制海軍軍備協定的虛耀宣言，瘋狂着的去努力遮掩牠們繼續不斷的高漲矛盾。這個事實不但是我們這樣承認，就是英國自由資產階級最著名的機關報“Economist”（九月二十一日）也是這樣的承認：

“要證明這個暫時協定為達到海軍軍備減縮的基本步驟，簡直是令人昏迷之事。”

“英美間的協定，不過是在某種限制內海軍建築的一個協定綱領，這種限制可以代表他們兩國所贊成的大規模海軍的最低限度。”

領袖的資產階級機關報于英美兩國一般的原則上已經同意的“海軍軍縮協定”這樣的寫着。牠那裏是軍縮的協定，直不過是一個海軍建築的協定綱領而已。

帝國主義者間矛盾的加劇及對蘇聯戰事的預備，決不容許任何真的裁減軍備，不過他們不得不使帝國主義各列強把戰爭準備躲藏在和平的烟霧後面，而去催眠無產階級的疑竇，在這個目的上，他們是被改良主義者所極力支持的。戰爭的危機越是逼近，帝國主義者越是切心地進行此種神祕的和平。

這些熱狂進行的戰事準備，自然也可以有某方面的暫時協定。例如海牙會議所結論大部分的協定，對於巴黎專家委員會計畫主要細目是接受的。但也正是這海牙會議的過程表現着第三期帝國主義事實上的矛盾是如何糾紛和不可解決啊！

去年，尤其在英法海軍協定終結以後，表現有兩個大的敵對的營壘：一方是大英帝國，法國（與牠的殖民地及歐洲臣屬國），日本；一方面是美國，德國，及中國。此為各帝國主義矛盾的主要陣勢，基礎於合衆國與大英帝國的爭抗上的。由於這兩個世界大列強的決定的優勢，我們可以預先知道，所有次一等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不出於此主要矛盾的這方面或是那一方面，所有較小帝國主義國家，不排列在此兩大對敵的這面就是那面。

海牙會議的外觀情勢，是表現着這兩個大陣勢的明顯衝突。對於楊格計畫的實現差不多是英國集團一致的奮鬥。美國則祇以一個“觀察者”所代表，他的活動還不能從報紙中得到具體的觀察。中國則無代表，而德國則為唯一的債務者，以與衆多的賠償債權國相對立。

但海牙會議化了好多時間都沒有提到德國賠款支付的範圍與方法上，而祇討論到賠償支付的分配。在這六個列強中：法，意，比，日，德，毫無保留的贊成楊格計畫，而大不列顛雖也贊成楊格計畫中的負債部分，但關於協約國對於德國賠款的分配案須作為保留。因此德國以相對的鎮靜偵視此種爭鬥，一直等到會議完結，結果分配的困難是解決了，但一部分是以德國為犧牲的。這個重要的戰鬥在長時期內都以英法集團間的鬥爭而進行的，結果形成了下面的奇特局面。

對於德國賠償支付的分配問題上，大不列顛是被其餘的賠償債權者，法，意，比，日，所分離而成孤立的地位。英國想從較

小賠償債權者，羅馬尼亞，瓦哥斯拉夫，及其他小國中佔優勢，也沒有得到最後的成功。

對於德國被佔區域的撤兵問題，法國則被離間而與英，德，比，的集團相對立。意與日則對此問題無甚興趣。

A. 斯巴協定，巴爾福聲明書，及楊格計畫

對於德國賠償支付的分配，有三個不同的標準，即是斯巴協定，巴爾福聲明書，及楊格計畫。斯巴協定，規定德國付給賠償債權各國的全數賠款，依百分比而分配。分配的標準——在對比利時的特別恩惠喪失的以前與以後，其數字如下：

	原來標準	比利時底均等喪失以後 (1925年巴黎協定)
法蘭西	52	53
大不列顛	22	23
意大利	10	10
比利時	8	5
其他小債權國	8	8

巴爾福聲明書宣稱，協約國內部的債務，既很明顯的不能作為一筆勾消，大不列顛必須由德及其他協約國之所得，足以使他付還美國的債務。

楊格計畫不理會斯巴協定及巴爾福聲明書，減低英國由德國賠償所得為百分之 $19\frac{1}{2}$ ，而使大不列顛對於缺乏“移轉”保障

直接的流動年金無份。

因此引起了全英輿論界猛烈的抗議，邱吉爾 Churchill 在國會中聲明，大不列顛關於斯巴協定的數目底任何減少，概不承認。雖然英國代表加入楊格計畫的簽約，斯諾登 Snowden 在海牙的態度由上述邱吉爾的聲明，也甚為鎮靜。

斯諾登宣布下列的要求：

1. 為保持斯巴協定所建立的分配標準，大不列顛應得的部分，每年必須增加四千八百萬馬克。這個增加並不會加重德國的負擔，也不會使別的小債權國受到損失，這是由意大利、法蘭西、比利時三國上打算的，因依楊格計畫(較斯巴協定)而使法、意，比從德所多得之數，乃是以英國來做犧牲的。

在極端複雜情形下的巴黎專家會議，會議的進行祇是關係各列強國登記並保護其各自的權利，而不顧及斯巴協定。依照楊格計畫做標準，由1929至1965年間每年各國平均所得年金如下：

法蘭西	1046.5
大不列顛	409.0
意大利	213.7
比利時	115.5
羅馬尼亞	20.1
巨哥斯拉夫	84.0
其他各國	100.0
	1988.8

這個分配與斯巴協定比較起來：大不列顛每年減少四千八百

三十萬馬克，而意大利每年却增加三千三百八十萬馬克，法國每年增加一百七十萬馬克，比利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二十萬馬克。

(照八月二十九日“Wirtschaftsdienst”的計算)

2. 大不列顛所得的這個支付比例，沒有如斯巴協定所建立的“移轉”擔保。

3. 以貨抵款，必須從速廢除。

這些要求是被完全以一種非外交上所應有的粗魯蠻橫態度而提出的，所以如“泰晤士報”正確地所觀察，海牙會議由其開始就隸於危機的騷動情形之下。英國代表的態度——當法國言論機關想嗾使和平主義者的麥克唐納爾反對『全國大戰最後清理』的斯諾登空虛的幻想失敗以後——是被一廣佈公表的麥克唐納爾的一封信所擁護，更被全大不列顛輿論所支撑，拒絕『四頭集團』（法，意，比，日）的任何建議，理由是英國並不想提出新的要求，而只是擁護由斯巴協定所應得的權利。這是因為照楊格計畫，大不列顛所得的總數將來雖足以償還英國支付美國的數目，但不能抵償英國已經付給美國之總數（大約四十萬萬馬克）。所以巴爾和聲明書所決定英國的所得必須足以償還其所支付這個原則，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因此英國要求一重新的訂正而在牠國內輿論界中得到熱烈的同情。

B. 大不列顛的政策在海牙會議的意義

(a) 英國工黨政府要對英國的資產階級表白牠在賠償問題

上是保護大不列顛資本家底利益的，特別是對法關係上，工黨比保守黨政府張伯倫的親法政策所成就的尤為堅定，尤著成效。

無論為工黨自身或為英國的資產階級看來，這種步驟寧謂為道德的而非物質的重要。大不列顛的每年歲收，總數為七萬五千萬萬或八萬萬鎊，大不列顛由賠償得來的，不過一百八十萬鎊，此不過僅佔總歲收中百分之〇.二五——是一個比較很小的數目。大不列顛也不參與任何實際價值無擔保的支付。

(b) 英國資產階級從最初就反對楊格計畫的，特別關於賠償銀行問題上。因為賠償銀行在美國勢力範圍之下，有對倫敦金融中心的重要有威嚇的趨勢。所有任何對楊格計畫的明顯惡感，都被加於大不列顛之上，而與其餘各帝國主義列強站在正反對的地位，英將不免蒙和平之障礙者的恥辱。所以這是英國新政策底利益，把頑強的附加條件加到英國原來的要求上去，使會議形勢陷于危殆，于是得到楊格計畫的修正。

(c) 英國底資產階級，關於美國的執國際政治之牛耳這件事雖在海牙會議上未曾表示，而事實上是根本反對的。這似乎是與海牙會議的外表面形態，與英美間共同海軍軍縮虛飾的準備，與麥克唐納爾及道威斯以交換友誼之流露相矛盾的。不過這種矛盾僅是表面上的吧了。

在巴黎會議上，美國的專家把意，德都放在牠底保護之下。

(此對德是僅在德被其他列強所壓迫的範圍內適用的，因為全德國正想望表演一個積極的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收回牠已失去

的一部分殖民地以及其他等等，此乃美國與英法完全一致所極力反對者）。反之，在海牙會議，大不列顛最初裝作德國的朋友，數週內英國反對為滿足英國要求而加于德國任何出於楊格計畫範圍以外的擔負。同時宣稱英國主張脫離法國單獨于九月十五日撤退萊茵駐軍。大不列顛更極力要求意大利的讓步。不過無論怎樣，最後結果（如近年來所常有的情形一樣），終是最弱者——就是德國——吃虧而已。

大不列顛在海牙會議的整個態度，是一種強力的頑固的示威表示，欲以此對美國做一警告，使牠知道英國是不能聽從美國的希望任意減低其海軍力而不加嚴重抵抗的。在別一方面與美減低海軍協定（不過是暫時的）之可能，法國在大陸對英國陸軍優勢的威嚇無疑地是一個主要因素鼓舞英國的資產階級，借着現時資產階級的正式代表麥克唐納爾及斯諾登的口嘴，來極力反對法國在海牙會議的希望。

這是很明顯的，麥克唐納爾與道威氏間的友誼流露，或甚至關於海軍軍縮協定的可能，毫不能改變了這個事實：即英美間基本的對立必須繼續成為各帝國主義者間衝突的主要因素，以及此種衝突隨經濟情勢的壓迫而愈加增進。我們可以看得出美國工業在高率保護關稅之銅牆鐵壁下每年增加的輸出，美國的資本輸出則把大不列顛從南美，加拿大，奧大利亞等處排擠出來。美國資本家系統的鬥爭及圖謀竭力想把英國的原料獨占變成極不重要，倚賴牠的大量金貨儲蓄，美國使用其信用政策制服英國，使英國

現在還經驗着金子繼續流出的困難。

從別方面看，我們可以注意到大不列顛並不是對於防禦他的地位完全沒有成功。由前英國駐柏林大使達貝倫爵士D'Abernon領導下派遣到南美的商業代表，在阿根廷著顯著的成功。結果定下一合同，阿根廷鐵路在最近數年內，將從英國運入價值二千萬元的鐵路材料。同時英國的輸出者，以此同數目之款，購買阿根廷的食品。此合同的結果同時是英國對於美國在南美搶掠底一個重要的政治策略。

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鬥爭，無疑地會因美國逼近的經濟恐懼而更加激烈，且早晚將引到公開的戰爭。第三國際第十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此事的情狀總括于下列的議決案中：

“不管麥克唐納爾政府與合衆國是如何磋商，或甚至有短期間的協定，也不能消除英美間武力衝突的必然性；反之，他們不過形成這種衝突中的一個階段，也如上次大戰之前夜帝國主義列強企圖一個諒解一樣，結果不過鋪下了1911到1918年的交鋒的道路。”

英美不可避免的對立底加劇，使大不列顛再也不能採取反法政策。斯諾登在海牙會議上無論如何猛烈地反對法國的要求，無論英法兩國與會代表個人的關係是如何的不善，大不列顛物質的要求最後之滿足，終不拿法國來做犧牲，而是其他列強的損失，特別是德國。固然英國決定於九月十五日開始撤退萊茵的駐兵，此又構成與德有利，而對法加以嚴重壓迫的。

雖然，我們對於德法報紙所發表的意見說：“英法同盟”（Entente Cordiale）現在是明確地一過去的事情了，是不能贊同的。因為要是英美間的矛盾必須造成戰爭，那麼，大不列顛必須保持與法國的親善關係，因為倘英國同時與法美二國宣戰，結果是也許（不，甚至頗有可能）要招致大不列顛帝國之毀滅的。反之如英美間的戰爭，臨近英之大陸列強不對美加以援助，則雖在海洋及殖民地有一個勝利的鬥爭，不免大大損耗英國世界列強的地位，但不至有實際的對英倫三島凌略的可能。

更一般的說來，技術的發展使英國在戰時不能得到與法國孤立的利益，迫使英國採取一免除與法戰爭的政策，一直須待到大英帝國國際關係的大問題，即英帝國與蘇聯或英帝國與合衆國的對立，用武力解決之後。

最後，英美間的矛盾，當全世界帝國主義在大不列顛領導之下對蘇聯的襲擊以前，也決不會引起公開的戰爭。這個襲擊自然要喚起英法的合作，包含法國底歐洲臣屬國在內。

所以我們看來，工黨政府下的英國政策底重要意義，不是想以英美聯盟代替英法聯盟，而是想重新得到歐洲的領導權。在英法同盟上，不居次要而演頭等的角色。為想孤弱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大不列顛對於撤兵問題幫助德國；替代法國在歐洲軍隊絕對的優勢，代以相等的實力，保持英國歷來傳統的自尊自大的外交政策。似此，英國的資產階級及工黨政府，想回復英國在歐洲大陸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如此的基礎上使牠更占上風的與美國相對。

立。

同時，大不列顛幫助德國經濟的與帝國主義的發展，是決不會軼出於相當的範圍以外的。現在德國的工業已僅次於美國，而成為英國世界市場上的一個勁敵了，因為這個緣故，以英德聯盟代替英法聯盟是不可能的。德國在政治上及軍事上，對英固沒有法國那麼危險，但在經濟上，則是一個對英更為危險的國家。所以英國在現在的關節上與德取友誼態度，唯一是因為德國位居歐洲中部故當攻擊蘇聯時可以發生極大的作用。

C. 海牙會議的成果

英法間決鬥的主要結果第一就是楊格計劃的變更形成對德不利，下面就是對於楊格計劃的變更：

(a) 在楊格計劃之內，德國的賠償，無“移轉”擔保之一部每年由六萬六千萬馬克增到七萬萬。

(b) 在楊格計劃以外，其變更如下：

1. 基於道威氏計劃由三月到八月間所超過楊格計劃的德國賠款三萬萬馬克，不退歸德國，而由協約國共同決定之。

2. 德國應付三千萬馬克賠償由九月一日起至撤兵止的費用。照楊格計劃，此問題早已由協約國政府中同意決定。

3. 德國放棄所有因軍事佔領所遭受損失的賠償要求。

固然，這些新的損失其數目亦頗為可觀，但他們不能算是損耗德國由楊格計劃(以與道威氏計劃比較起來)所得的利益，如「

繁榮指數」的取消，每年償還總數的減少，特別是在前十年，鐵路及工業擔負的取消，及德國銀行與其他等等利益。以最近變化的消息，雖是不利的，德國證券交易所有一個高度的向上運動，就是一個前兆。

海牙會議最大的利益乃為大不列顛所得。斯諾登完成其所要求至百分之八十。斯諾登所要求的為四千八百萬，而他成功的數目至每年超過楊格計畫四千萬馬克。四千萬馬克由以下湊成：由三月至八月道威氏計劃較楊格計劃標準德國剩餘下的數目，直接交給大不列顛一萬萬馬克，平均每年得七百二十萬馬克。其餘二千八百八十萬馬克，由其餘賠償債權國家擔保，意大利拿出九百萬（八月二十九日『泰晤士』）。大不列顛依這樣計算還祇有三千六百萬馬克，但因賠款是每月一付，而英國付還美國的債務是按季交付的，此兩個月的利息算上去，大不列顛支付與美國的總數就由三千六百萬馬克增加至四千萬馬克了。

大不列顛由德國的移轉擔保所得的賠款，把上面四千八百萬計算在內，大約每年一萬萬馬克。若依照斯諾登所要求的，照斯巴協定百分數，亦不過為一萬二千萬馬克。最後關於以貨抵款，意大利同意為鐵路之用三年內每年購買英煤一百萬噸。

法國在海牙會議無所損失，無論是依照楊格計畫或是對於移轉擔保總數，法國適得到德國賠款的全數。

被犧牲的不僅是德國，意大利及其他較小的賠償債權國，亦受犧牲的。意大利損失，上述的每年七百萬馬克，較小的國家不

不得不放棄牠們對移轉担保賠款的分額，以滿足大不列顛的慾望，並用多種方法担保協約國間的債務。

D. 關於賠償銀行性質的爭執

海牙會議的一個最有趣味的“結果”，就是在楊格計畫中規定指派一個“國際賠償銀行組織委員會”，還沒有實現。所以楊格計畫沒有賠償銀行——此為最主要的一項——的實現，也執行了。這並不是因為關於賠償支付的分配及萊茵撤兵磋商所以延緩；反而是因大不列顛故意延緩磋商之進行以阻礙賠償銀行的同時成立，這無疑的是英國銀行資本對於合衆國銀行資本的暫時勝利。

各關係列強國家對於賠償銀行的性質及其職務，有甚大的不同意見，這是很明顯的，因為楊格計畫中所包含着賠償銀行的內容，本質上是反映美國國際銀行家莫爾根 Morgan 及拉門特 Lamont 的立場（他們與英國代表斯丹普 T. Stamp 個人間成立一私人的聯合），所以對於賠償銀行的性質及設立在什麼地方當然有嚴重的爭執，因各國列強的政治代表不願屈服於美國計畫之下。此次鬥爭，最重要的腳色，是大不列顛的金融資本，因他是最受重大打擊的。

英國資本家代表對於超出一個賠償銀行職務的組織大綱，特別是提出反對，英國代表解釋此全盤計畫是美國的，一個企圖，想站在國際旗幟之下，造成一種工具，以為攻擊倫敦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國資本家的這種反抗在楊格會議時，已有部分的勝

利。由美國規定的原來三萬萬元的股本減少為一萬萬元，祇有二千五百萬元的是立刻收足。

以後，大不列顛反對銀行的宣傳，成功地接續下去。牠特別着重地指出美國政府並不參與銀行家的意見的。在美國方面對於國際賠償銀行的企圖也有極端懷疑的意見，尤其是德國以貨抵款的辦法能否使發達落後國家調濟金融這一點。

法國對賠償銀行也有種種的懷疑。

就是賠償銀行申明為一個國際組織有利益的德國，對於賠償銀行的實行能否實現，也抱十分的疑懼呢。

合衆國銀行家為保持楊格計畫，極力想給賠償銀行一個最大的權限。賠償銀行的活動範圍愈是擴大，則牠對合衆國資本倚賴性更大。美國看到這種事業單靠自己的力量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必定要使賠償銀行漸漸的成為美國銀行的工具。恰好相反，英國的銀行家及一般的工業家，是希望賠償銀行的活動範圍盡可能的縮小，使牠不過成為賠償國及各協約國債務償還的清理帳房而已。

同時在各方面又有各種別的意見。在合衆國，主要的是工業資本家，特別反對銀行家奢大的計畫：因為他們知道現在美國借貸產業資本家高度利率，倘把美國資本再向外投資，更不是有利的事情。在英國一方面，同樣的有些人對於具有絕大權力的國際“超等銀行”的觀念是贊助的，道威氏及楊格委員會委員之一的斯丹普，就是一個對於賠償銀行熱情的擁護者。但他也可以說是一個例

外吧了。

在另一方面，德國資本家希望——在這一點並不過分希望——賠償銀行將來幫助調濟德國對外貿易的金融，特由以不能移轉的德國赔款在本國內投資（一有組織的形式移轉）；而“不發達”的國家倚靠着資本的輸入，並不希望牠們的輸入被賠償銀行所調濟。賠償銀行的不固定性是很大的。在國際聯盟開會時，波蘭，丹麥，那威，就是提出賠償銀行應附入國際聯盟，這議案被路霞 Loucheur 以對賠償有利害的主要列強國的名義所打消。

這些利權的衝突，加上賠償銀行建立地點的爭執，事實是因為雖然楊格計畫自九月一號實際上（雖非正式）發生效力，而賠償銀行的組織則正在草創時期。關於委員會如何招集及集合的地址在何處討論了好久後，各國委員最後決定在九月底十月初在貝丹 Baden-Baden 招集開會。各國經詳細的考慮後，祇如楊格計劃所規定着的定出股份資本為一萬萬元。我們可以記憶到的是美國政府禁止聯邦準備銀行去參加賠償銀行之任何正式部份，因為這個理由所以紐約第一國立銀行總理兼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理瑞諾德 E, Regnold 被歐洲中央銀行經理所指派（並經莫爾根及楊格之推薦）去計劃組織委員會。

最困難的問題，是新銀行的總行當設立在那裏？關於這個問題，據九月十六日科隆時報 *Kolnische Zeitung* 所載已經與英國成立妥洽（英國是極力主張設在倫敦的）設在日內瓦，似此則銀行的地址將為瑞士，銀行的經理則屬於英國著名銀行家尼麥愛 Ni

emayer。這報告究竟是否事實抑或純粹為德國的一種理想，則到現在尚未可斷言。

以某種或別種形式，銀行是準可以成立的。不過美國的銀行家的雄心計劃將受到很大的打擊，各帝國主義者的戰鬥將在賠償銀行內而繼續下去。所有一切大規模的計劃將受相當阻碍，這是很明顯的一樁事情。

F. 帝國主義對立的加劇及裁軍的欺詐

海牙會議的結果，乃是以楊格計劃代替道威氏計劃以決定德國支付協約國的賠款。我們打算簡單的摘述由這種變動影響到帝國主義的衝突，以及影響到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形成。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實際上是互相交錯互相連貫而不能分開的，但我們為便利計，先各別的分開來敘述：

1，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根本對立，由楊格計劃的採納，而更為增高，企圖以戰爭的方法強暴地解決此矛盾，也尤為高漲。在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聯合戰線上，德國為最弱的一個環節。德國資產階級，因為失掉牠的殖民地及對外投資，艦隊，又負上了賠款，更加以他的經濟指揮權操在外人手裏，裁撤軍備及重要區域被佔據，這些都因戰敗後屈服了，因此嚴重地阻礙其新帝國主義之發展。甚至想一時得蘇聯的幫助，以免得一味乞憐于協約國的強盜們。

不過，德國資本主義建設的進展，是以同等程度使帝國主義

的德意志與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的矛盾明顯地增大的。『東方』與『西方』的東方間調度的政策，漸漸的變成明顯的反蘇俄戰線。這不再是一個原則的問題乃為代價的問題了。關於賠償問題在海牙會議得到了一個妥洽——萊茵撤兵及德國主要經濟機關公開管轄的終止——使德國資產階級易於加入西歐列強（德國已往的敵人）的共同反蘇聯戰線。

帝國主義內部的對立，轉變為社會制度背景的對立（一方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另一方是無產階級的統治）。楊格計劃的接收促使德國加入反蘇聯戰線而增加對蘇俄戰爭的威嚇。

德國的資產階級是怎樣堅決地從事戰爭的準備，由德國國會議員 Klonne（他屢次與法國將軍及法國議會議員 Reynold 有關于軍事協定的商議）的活動中可以顯示出來。Klonne 甚至將這種談判報告德國外交部。利希貝 Rechberg 的申說德國與法國首都的關係之密切漸漸得到相當的政治效果等，我們也可以窺出弦外之音了。

雖不被人注意，而性質上同樣重要的，是英國財政家斯脫拉口希 Strakosch 的建議，由國際聯盟組織一金融機關，幫助無故被襲擊的國家（注）

注——見 Sir Henry Strakosch “防止戰爭的財政計劃”一文，倫敦，一九二九出年版。參看“國際聯盟經濟的與財政公報”，1929，II，14。

這是毫無疑問的，全盤計劃雖不會提及俄國，但是為對抗蘇俄而作的。其主要的意思是：被攻擊國家應付給他以國際聯盟的信用，須受三方面的保障：一方是有關係國；一方是“金融確實穩固”的國家，（即指領袖帝國主義列強各國）以及簽約諸國。全機構是和平時期預備好而一當戰爭時便發生效力的。他們所說的理由自然是好聽得很，牠被指出來說用這種方法使各國在和平時期免得有準備盛大軍備之必要。但全盤的計劃顯然是單獨對抗蘇俄的，這我們可以由下列條約中看得出來：

“本協約對於加入簽約國際聯盟之任何會員，當國聯理事會一致承認其被他國所攻擊或受威嚇時，得發生効力加以援助”

顯然，國際聯盟是代表資本主義列強利益最衝突的一個機關，除非對蘇聯看做是一個挑釁者外，是決不會一致的決定誰是挑戰者。所以這是很明瞭的一件事，這不過是保護與蘇聯接近的國家，更進而以國際聯盟金錢的幫助，使他們更準備好對工人的國家開始挑戰。

設如我們再加上最近數月來中國政府在滿洲前線上不斷的挑釁，這終決不能視為沒有領袖帝國主義列強的明白贊許底行動吧。我們看到反對蘇聯的戰爭，是如何的在各方面系統的預備着呵！

2. 歐洲債務國集團，包括一方面的德國，與別一方的合衆國底對立，由楊格計劃而成有機的具體化了。楊格計劃的全結構：把年金分為一個總額（大部分由移轉協定擔保）增加給美國，其餘（小部分，不被擔保）實際歸賠償債收受者所得，後一部分的

限制至三十七年，而付給美國的年金必需再二十二年（即經三十七年後之二十二年——譯者）才能付清；規定三分之二合衆國對協約國的債權須向德國取債，德國直接與其他協約國相結合支付給美國——這些都是表示使德國及歐洲債務國一致以與美國相對立，是把歐洲的債權國與倔強的美國底對立簡單化與組織化的。這也是歐美衝突的加劇。

此政策的繼續，可由白里安宣傳組織一歐洲合衆國的企圖中看出來。歐洲合衆國的企圖，是明顯的為直接對抗北美合衆國及蘇聯的。此政策的宣傳，還未能得到具體的成效。大不列顛特別證明不贊成此計劃，其中，大不列顛政策的目標是要使大英帝國成為一個無論較北美合衆國或歐洲合衆國都要強固的完全獨立的經濟單位。

北美合衆國對於大歐洲主義作相反與保守的觀察。國務院商業代表克來姆 J. Klem 在九月十八日宣言『美國毫不懼怕歐洲經濟的結合』，因各個競爭的獨立國家，想結成經濟的結合而沒有政治的聯合，顯然是辦不到的。

3. 大不列顛與合衆國的對立，現時占統率地位的帝國主義者的對立，如上面所述在海牙會議中各方面已明顯地表示著。賠償的問題，及協約國間債務的問題，是英美間普及世界整個複雜的對立中一個（而且重要的）因素。

當列強在海牙會議關於“大戰結果最後的清理”正在爭論的時候，麥克唐納爾正與道威氏關於海軍軍備限制免除將來戰事造

行“和平”的磋商。在對美的關係上，英國所演的角色和集會於海牙會議上的歐洲大陸的代表有大大的差別。

在海牙會議上，大不列顛是遭攻擊的。因所有參加國家都希望接受楊格計畫。斯諾登是以一個強頑的人物的態度著重英國世界列強的地位。

在對美的關係上，英國是被威脅的。一方面世界各處，美國很有成效的打擊大英帝國的經濟優先權。美國的輸出，是以英國的輸出為犧牲而擴展的。大不列顛的原料獨占，是面對着合衆國獨占的購買組織。再關於資本輸出，大不列顛一再被這市場及他市場所驅逐出來。因美國有廣大的國內市場，高率關稅的保障，超過大不列顛數倍以上的購買力，美帝國主義不住的在大列顛帝國的犧牲上獲得他的利益。這種壓迫是最大不過的，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是“成熟”了的，而國外投資比較國內生產的發達還更有利益些。經濟的鬥爭，必定會高漲為武力的衝突。

海軍軍備限制的磋商，乃是戰爭預備的一部分。合衆國在此兩列強中政治上及金融上的優勢，使英國放棄關於大戰艦傳統的“兩強標準”，而贊成與美國平等：現在他們要求同等的巡洋艦；大不列顛或者是允許合衆國大量的新建築以達到與英平等，或是採取“自願的”同意限制自己的軍備以建設平等，這兩條道路任英選擇。第二條道路，是比較便宜點的，第二條路有可以用和平詞語遮掩實力讓步的可能性。所以麥克唐納爾為限制裝甲巡洋艦建築去訪美國，未必會得到任何“成功”。“成功”的祇有由於

巡洋艦的平等，使合衆國更容易選擇大戰暴發的時機吧了。

關於巡洋艦的同意，因海軍技術上的變更，更變成容易了。因海軍的技術的進步使大巡洋艦也完全變成舊式的戰術。小而速率更快的單位，如潛水艇，飛機與飛行母船，及飛行船等使兩列強將繼續競爭造成美國關于巡洋艦所已獲得的平等。

關於麥胡間在美的個人談判，會發表下面的官報：

“兩方一致同意於以下數點：

“1. 本協商為弭戰公約(開洛公約)的產物與直接的延續。

“2. 艦隊平等的原則是把所有在華盛頓協定所未概括的各種船隻都概括在內，這個平等將在1936年十二月底完全達到。關於這一點英倫政府曾與英國殖民地政府商議，平等的定義是包括大英帝國的所有海軍武力在內。

“3. 希望提出修改戰艦的年限問題，以此免除由1922年華盛頓協約內全補充條文的執行。

“4. 兩國政府同意，潛水艇必須完全廢除，但此步若沒有所有列強加入是不能實行的。”

基於此次的協商，結果發出五大海軍列強國於1930正月會議於倫敦的請帖。

為海軍軍縮的協定，在英國遇到不小的反對呼聲。海軍協會的主要會員寫給“泰晤士”報（十月八日）一封信可以做一種代表，“實在，此刻我們還沒有到削英國之足以適美國之履的時候，因為要使我們有縮軍之必要的危險毫未嚇着美國”。

在紀念牌上之別一面，美國簡直的是一個羞辱收穫者。在1927年，大造船家費了數千萬元給這個投機者到日內瓦去，去搗亂日內瓦海軍會議；現在他要求增加二十二萬五千元，因為他在日內瓦的活動，使獲利的造船企業得造軍艦，得取三萬萬元的價值。

在又一方面，當麥克唐納爾在美國時，波拉 Borah 提出“海上的自由”，這表示美國人對於協定都不能完全滿意呢。

不過，此協商非得其他三海軍國，日本意大利與法蘭西的同意，並依照所定的比率實行牠們的海軍建築是不會發生效力的。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實。但即使海軍軍縮會議失敗也不會使這協會之發起人（英，美）感受不安的，因英美二國可以照常進行他們的軍備，而將罪過完全推諉在他人之身上，于是在和平主義者的眼中，也得顧全他們的面子。法國也想毀壞此次協定，提議海軍的問題可以由『軍縮會議』解決。

此乃表示一種拖延，顯然不是裁軍的拖延而為軍備比例的限制之延怠，因為國際聯盟軍縮會議實際上就是表示反對裁軍。

海軍最強的兩大列強，大不列顛與合衆國，建議廢除潛水艇，而法，日，意，則不願放棄牠們的武器，因潛水艇在防止敵人巡洋及戰艦佔優勢的國家是很有用處的。

意大利要求所有小種類軍艦與法有同等的實力，此又為法國所反對。

還有值得檢討的一點：

大不列顛與蘇聯尖銳的對立，不得不對美取防守的戰線。因蘇聯不僅是工人運動的中心，而且還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革命解放運動的中心，而英國是最為殖民地革命所威嚇的。現在大不列顛是反蘇聯戰線上的一個領袖。但要是英國與蘇聯引起戰爭，牠必須暫時避免與美的戰爭，而想企想得着美國「友誼的中立」。

胡麥間的談判，也很明白的提及他們對付蘇聯的態度上。因海牙會議的成功而勢力增強的英國底資產階級想得到一個暫時的協定，為的是集中一切的勢力去包圍蘇聯。由工人羣衆的壓迫而實行的英俄復交政策，決不是與這政治的戰線相矛盾的。

4. 英法間的對立（雖因張伯倫之親法政策遮蔽着，但沒有根本消滅）又很銳利地顯現出來了。不過，如我們上面曾指出來過，要是說英法的關係在現在是與保守黨政府下完全相反而取敵對的形勢，那又是決不可能的事情。因現在軍事技術及政治的地位（反蘇聯戰事的預備與對美的衝突的不斷嚴重），大不列顛被迫着不得不與法保持『友誼』的關係：至少必須得到法國『友誼的中立』，倘英國要得到與蘇聯及美國進行戰事時的自由行動。

5. 英德的對立，特別在海牙會議關於以貨抵款的問題上表現得特別顯著。大不列顛一部分的勝利是以德為犧牲的，即英意的石炭協定是。

大不列顛對德的關係是有二重性質的：在世界市場上，德國

是愈益活動的成為大不列顛的競爭者。在煤礦，機械工業，造船，電氣工業，及人造絲工業上，德國是大不列顛最危險的敵人。

在另一方面，大不列顛在政治上，又三方面依靠德國的。第一，在對蘇聯的鬥爭上，德國是波蘭重要的一道後防線，是製造戰用品最重要的工業區，是軍隊運輸交通的要路。第二，在對美的鬥爭上，德國是歐洲債務國集團最主要的反抗美國成分。第三，在對法的關係上，德國是相當為防止法國「與牠的臣屬國」執歐洲大陸的牛耳的工具，如保持勢力的均衡當然是有利于英國。

經濟衝突的尖銳化，是必然要引到更露骨的政治敵對。德國社會民主者及資產階級左派政黨所懷抱的希望以為現在英法聯合是可代之以英德聯合了，這是完全不明瞭基本經濟事實所致的誤解。

6. 德國與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在巴黎及海牙兩會議中最有力的表現出來。德國內部經濟之發展，以及獨占資本主義浸浸日上之進展——不管賠償責任如何——促進其要求製造品之消售及原料供給的各區域底獨占。經濟的基礎與政治的上層建築（裁減軍備及殖民地剝削的缺乏）是太大的一個矛盾。在對外的政策上，這是反映在德國資產階級希望世界的重新分割。這個希望，引起了對於占有殖民地列強的反感，特別是承繼從前德國殖民地的英法。

德國資產階級與殖民地列強這個根本的對立，海牙會議是決不能夠減輕分毫的。

楊格計劃：祇稍稍加以修改而經海牙會議的批准，不過是一個暫時妥洽，並不能把賠償的矛盾消滅，祇是把賠償問題隸於一個新的國際解決方法之下，因為現在的形勢道威氏計劃已不適用了，這解決自然不過是暫時的；沒有一個國家認真看重此種協定（適用六十年的）。麥爾黑特爵士 Lord Melchett 在其國際工業及楊格計劃（第十頁）的小冊子中說：

『無論那一個委員會，想去解決超過人類理知的範圍以外的問題，想預先決定經濟世界中最主要的情形（這是時刻在變化的）六十年內國際事情的成果，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勞易喬治更簡要而着重地說：

『沒有一個人能相信，德國差不多兩世代，每年要以外國貨幣支付牠的債權國一萬萬鎊的賠款。』（八月三十日 新佛來恩新聞。）

政治情勢一轉變，這是在急劇的變動着，一個暴烈的鬥爭隨即跟着一個新的規定，真的，此鬥爭已由德國開始了。

巴黎會議同海牙會議，於賠償問題得到的讓步最重要與最直接之效果，無疑的不過使國際的資產階級有更堅決地取反對蘇俄鬥爭之可能。海牙會議的主要成果，乃對蘇聯戰爭危機的增長。

“資本主義的德謨克得西必然是偏狹的，毫無顧惜的將窮人排除出去，因此他是偽善的和欺詐的，但是從現在的制度進步到逐漸擴大的德謨克得西，這一種進展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的教授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與和平的。決不如此，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進步的發展是要經過普羅列塔利亞之專政的。而且非如此決不成功，因為要破壞剝削人的資本家之抵抗，除了普羅列塔利亞之專政外，更沒有別的方法”

——伊里基——

蘇維埃經濟的五年計劃

M. Dobb 著 王 果譯

(譯者：——關於蘇俄的五年計劃，國內已有不少的介紹，這篇是研究蘇俄經濟專門學者 M. Dobb 氏在“勞動月刊”上最近的介紹，亟為譯出，以饗讀者。)

這是什麼原故，在蘇俄的舞台上，那為經濟發展而擬定的五年計劃在目下是占着那麼重要的地位呢？目下蘇俄的各種設施都是向着五年計劃在進行。在它本國，一切的辯論，演說，甚至任何的談話，沒有五分鐘不談到這個計劃的。要描述目下的蘇俄，如不拿五年計劃作為中心的論旨，那是不會完全的。

五年計劃之重要是有兩重原因的。第一，蘇俄為要成功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這以後的五年就不得不成為緊急而且決斷的期間——從它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要轉變到一個有西歐效能和技術的成熟的工業國。在這短促的五年之間就要把那在十九世紀變革了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工業革命的精粹聚集在一塊——不僅此也，

在蘇俄，現刻對於那些近世最革命的東西，如電氣和新式耕種機，也非完成不可。第二，這是件事實，經濟組織的集中經濟計畫，是社會主義的組織之最特色地和資本主義組織相反的地方，也是社會主義的組織超越于資本主義的組織最重要的技術優勝處。雖然資本主義可以自身組織起來，以獨占的結合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因素克服它那自身的安納琪，可是，它自身的特色，是以安納琪的放任管轄一切主要的經濟運動為前提的。

假如不是因為有這個重要的經濟的優點，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要想把社會主義單獨地建設在俄國，這恐怕是辦不到的吧。不管它有怎樣勇敢的群衆的熱忱，客觀的環境——它資本的缺乏，技術人員的缺如，同歐西通商的困難，和戰爭的危機——都不許可它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蘇俄將要不斷地被這個問題所苦惱：即她將為工業進步的利益而犧牲社會主義的推進呢，或為社會主義的推進而犧牲工業的進步呢？但基礎在有計畫組織的經濟生活，為從前所不可預測的經濟，就深藏有建築社會主義的基金以克服那在資本家眼中所認為絕難超越的困難。在他所開闢的產業化的可能上，就藏有一種經濟的基金，從這基金中可以找出本國源泉來完成產業化的工作。產業化自身促進和增大蘇俄經濟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供給那社會主義計畫更進一步的克服，一般民衆生活標準再度的提高，和技術更增進可能底基礎的。

在大戰前，俄國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屬於農民。在工場制的工業中，大約只有二百萬的工銀勞動者，而在小規模的製作

坊和村落間的家庭手工工業裡，倒僱用了大約四百萬的工人，出產品則占全工業產品的三分之一。俄國的農業，是非常幼稚的，約四分之三的耕種地面，是以舊式的不經濟的分割制即分田制(Open field)的小農經營。在一定期間又復行分配着，他們沒有近世的收獲循環法，也沒有近世的收獲和耕種的農業機器。在大戰前，全俄有新式耕種機的數目，也許還不到五百個，而這些利器，又幾乎地主的田地裡才有。俄國的運輸組織還是在一個極其幼稚的階段上。陸地的運輸，幾乎是沒有，除了在那種一當着大雪的融化，或大雨傾盆就常常不能通行的道路上，有着農人的轎車和載重車。俄國在每一百平方基羅米突的地面，祇有一基羅米突的鐵道，與英國和德國的每一百平方基羅米突的地面而就有十二基羅米突的鐵道者，有天淵之別。並且每一萬居民，才僅有五基羅米突的鐵道，除了塞爾維亞之外，可說是較任何歐洲的國家都要少。俄國主要是一個輸入工業製造品而輸出農產和礦產品的國家。（它的輸出中，完成的工業製造品還不到百分之十，而過半數則是食糧）；並是，它的工業多半要依賴外資和外國技術人員。

五年計劃的目的，就在打算把這偌大的半亞細亞的國家變成一個成熟發展的工業經濟國家，把它的基礎建築在大規模的工業，電氣化的事業，和機器化的農業上。並且，五年計劃還打算在盡可能的最短期間實現出來，並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這不僅給我們一個歷史會親眼看見的在經濟的產業底基礎上一個最

迅速地變革的例子；並且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自覺的計劃和有系統地指導着——並非由自由放任，而見諸實效的一種變革。

爲這工業化的基礎，“五年計劃”須得準備那跟着五年（過去十二個月算爲第一年）所必須的總投資額六百四十億盧布，相反於曩昔之五年中才二百六十億盧布。這個將要增加本國的基本資本半數，工業的資本增加一倍，鐵路運輸的資本亦增半，農業的資本則增三分之一。這樣的結果，工業的生產，在一九三三年終了，可以超過戰前的水準三倍，農業的生產倍于戰前的水準一又二分之一，而全國民經濟的產額，將要兩倍于一九二八的數字。

在電氣化的事業裏，正計畫着四十二個新的電力站（大半數供給幾省之用的）來增加電氣碼力的產量，每一年從 5000 兆增加到 22,000 兆克羅瓦特。同時，堅決的趨勢將繼續地向着經濟制度中社會主義成分特殊優勢而進行。百分之九十二的工業出產額，是計劃着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內要社會化，以與那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內才百分之八十的相對照；農業中百分之十五要社會化，相反於過去之百分之二；貿易額百分之九十一要社會化，相反于過去之百分之七十五。國家收入是計畫着，每人要增加百分之五十六，實質工資要增加百分之七十，農民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煤的出產量，蘇聯現時已進到第五位上了，只次於美、英、德和法國，法國每年煤的出產量約五十二億噸，而俄國則爲三十五億噸。這可以預期着，在一九三三年，俄國就可

以超過法國而升到第四位上去，同樣，俄國的化學工業出產額也可以希望在一九三三年可以與一九二七年德國的出產額相等。

高度地發展了的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它那高級的有機構成的資本——“力在肘後”如美國作者所誇示的一在工廠裡，平均對於每個工人有4.3匹馬力。蘇聯只有狠低級工資本構成——平均對於每個工人，還不到一馬力。但現刻計劃在一九三三年，這個數目將增加到對於每個工人有二匹馬力，即達到美國的一半水準了。

這樣的一種工業化的速率，對於資本主義的世界將要視為是不可思議的（除了用那輸入大批外資以供發展之特殊方法外，如德國在1925—28年為實施合理化之例。）這視為是如此地不可思議，以為五年計劃不過是荒謬的空想，一種粗率的宣傳詭計，適足當作嘲笑資料而已。在英國合理化的問題，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裏曾說過由合理化而獲得龐大的經濟這種可能性（除了藉助于預先投下巨額資本外）是很小的。在一個較英國工業尤為落後的國家，自然，獲得這種龐大經濟的可能性是比較大些。反之，蘇聯為重新建設它的工業，而想獲得必需的資本這種事情，是較資本主義國家困難得多的，因為它如沒有某種不可能的讓步就不能獲得外資，並且它又不採用那種資本主義國家所常用的揩取方法。從這樣的一種狹窄的客觀條件來觀察，在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着的這種速率可驚的產業化的可能性，自然要被視為烏託邦了。沒有泥土，是造不出壟來的，不管它怎樣熱心造去。

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本質的差別是：蘇聯經濟組織是建築在有計劃的基礎之上，並且在工人自身的管理之下，這一點立刻就顯示有重新組織經濟合理化很大的可能性，這種條件在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之下根本不存在過。舉例來說：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合理化之實施是隨處都碰着競爭利潤和投資利益的阻礙，這由於在一大堆不同企業的人們中，很難子得到共同一致的行動和意志，並由於自由競爭的嫉忌和傳統的保守性，以及勞動階級的阻撓的緣故。

再舉例來說，雖沒有週期的恐慌，但能收迅速發展之成效，或至少能大大的減短這種恐慌的時期，和周期恐慌的影響，是一個有計畫的社會主義組織巨大的勝過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誠然，資本主義曾努力想以集中資本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如社會民主主義和目下工黨政府所負為任務的）來從事於為它自身獲得這種優點。可是，資本主義所能做到的，是極其有限的，充其量也不過在國際市場上更加緊矛盾的現象，給勞動階級更鎖上一道桎梏吧了。因之社會主義的合理化開闢了從古迄今未嘗聞知的一個有優點可能性的境地；就是這種優點，所以使俄國目下是很有自信地以極度的速度來實現它的產業化的程序，如五年計畫中所擬議的。

至於社會主義合理化的這種特種經濟的數量的含義，那非待它們實施後，是不能確切地解說的。這個在社會主義經濟裏還是個不知的因素。“右派”的人們對於去年俄國政府的政策底批

評，就是把這種可能性估量得太低。像布爾喬亞汜的懷疑主義者，他們以為哥斯計畫 Gosplan 烏託邦的估算，和現刻計畫着的工業化的速率，同是太高了。他們批評特別的立腳點是以農業發展落後的俄國，農業在前兩年，沒有穀米可資輸出，甚至連市場上都不敷用，並且物質原料的供給也很缺乏，因之會牽制工業的發達。農業在小規模底個人主義的農民底農業基礎上已達到了它發展的極度。或者是勇敢地發展到大規模集團化的機械農業；還是提倡半資本主義的大農莊，二者必取其一。右派 (Bukharin, Frumkin, Tomsky, Serra) 都不相信前者之可能，而把後者視為解決他們所視為前途阻礙的唯一方法。

但是，時間推進的結果，証實了這種懷疑主義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農業的地位仍然在窘拙的狀態之中，因為要分派逐日無數的食糧的需要，不得不把需要限制于有效益的供給的範圍內。例如，肉，在市場上現刻很稀少，全由於去年農人們因為缺乏稻草而全把幼小的牛羊整批屠殺的原故。同時，輸入之所以不盛，也由於缺乏穀米的輸出。不管那“反抗大農”的嚴厲政策，今年播種的地面上勝過去年的。並且秋收的穀米幾乎要三倍于去年。國家的和集合的農田的發達是超出預計之外。阿爾德鳩郎梯，(Wr. Walter Duranty) “紐約時報”的莫斯科通信員，在他的“集合的農田運動底初次成功——從革命以來到‘社會化’的農業的第一次真的試行”中寫道：

“兩年前，僅僅百分之二的開闢地面是社會化，但這種比例

在去春時，全蘇聯已達到十分之一了，並且可以預料在十月尾時，達到百分之十五。要說社會主義已經克服了俄國鄉村的話，這未免還早一點，不過至少是深深的影響了鄉村生活，並且以非常的速率在把它推進着呢。”

在工業上，原來的五年計劃不僅在一年前以一種向上的方向加以修正，並且現實的成功，似乎還超過修正的五年計畫的估計。因為五年計劃的起初十個月，即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工業出產品之增加超過去年同一期間百分之二十四，以與預算增加百分之 21.4 相對較更要進步得快些。這樣，來年的出產(1929—30)是估計着（超過於校訂的五年計劃）可以達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驚人數字。同樣，原計劃預備在 1928—29 年蘇俄社會主義共和國有七千個集合的農田組織起來，並且全市場穀米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三三年要由國家集合農田來供給。在經濟年起初八個月中，就有一萬一千的集合事業已經開始，並且現刻預計着在一九三三年時，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市場上穀米是可以從社會化的事業中生產出來。現刻這兒是喊着“在四年中實現了五年計劃”。

這種十分驚人的發達原因，我們可以從 *Economicheskaia Zizn* 叫作‘社會主義經濟偉大的貯藏’——即由社會主義的合理化和一種有計劃的組織所發生的特殊經濟中，可以找出來。兩個例子可以舉的，配合着一種交代勤務制與一天七小時的勞動，以及一禮拜五天工作制，在這種制度之下，每個工人在每六天之中有一天休假，而工廠的工作則不間斷地連續進行——重要的“節

省資本的經濟”，使機械和器具更有效能地使用，而同時一大部份的工人則被引導着去工作。

五年計劃對於我們的運動上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的，縱離開它偉大的歷史關係不說。五年計劃能够指示出我們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並不是如一般人常常加到我們頭上的消極的感情用事，更不是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在俄國，我們就有一種應被全世界勞動階級所擁護社會主義合理化建設的例子——祇有在這種唯一的條件下合理化才能够完美地發展和長久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合理化實際地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相較時，誰也看得出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壞處，並且為我們歷史過程的責任是應加以反對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的根本不同之點就是：俄國產業的合理化是發生在權力已轉移到勞動階級，和布爾喬亞祀的權力已經消滅之後。因此，每種合理化的成功，每種資本構成和勞動生產力進展的階級，增強和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反之，在資本主義的英國合理化的成功，只不過鞏固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祀的統治，而拖延勞工的統治和社會主義的到來吧了。

在勞動階級的社會裏，一般工人在目下所不得不作的犧牲——如他們要以現下的速率來完成蘇俄的工廠，電力站和鐵路所不得不有的現時享樂的無限犧牲，是有它完滿的代價的，因為由此就可以提高工人們自身或他們子孫的生活標準。由合理化而得的果子是獻給那忍苦耐勞地從事於實現合理化的勞工們的。不似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合理化的結果只是增大剩餘價值，以飽資

產階級的慾望。勞工們忍苦耐勞，而別人坐享其成。

第三，社會主義的合理化，是可以最少限度勞動的辛苦而達成的。因為這種合理化，由在勞工們自身管理之下有計畫的去實現，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幾乎必然地伴着恐慌和失業，因之這種轉變的壓迫全部都降臨在一般工人的身上。在俄國，這種恐慌可以用經濟的計劃來避免，並且這種轉變可以規律着以阻止新技術新機器排擠工人的影響。實在，任俄國，隨合理化的進行，同時也把工資增加了，工作時間減短了，並且交代生產制使僱用的人數增多。

最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現刻幾乎隨處都和獨占分不開的，而獨占只是提高那在獨占下的生產領域的價格和利潤的水準，因之增大勞動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剝削。反之，在俄國合理化的進行，是隨着一種有計畫的價格的低落，把利潤降到最低的水準，使出產和出售有極度的開展，不至于有過剩生產的週期阻碍。擁護俄國社會主義的合理化而同時反對英國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就像一個醫生，他開給一個病人對症的藥方後，想把病人所服的各種賣江湖的藥品取去，因這種藥品一般是有害的，但當病人還是信仰庸醫時，那不過阻止他勇敢地服這有效和對症的藥品吧了。不過倘使醫生僅是嘲笑庸醫的劣藥，那良醫的方子更不會被信任了——所以他必得自己提出藥方來而證明庸醫藥品的不合科學。

英美的鬥爭與英國的帝國統一

Gore Graham 著

山 夫 譯

生產力的增長和世界市場的縮小之間的矛盾現在是一日比一日地尖銳起來了，其結果，這是一切的革命工人都十分明瞭的，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現在的英美的鬥爭就是由這種矛盾產生出來的一個主要的對抗。在日下的虛偽的英美和平談判，戰爭的否認，巡洋艦噸數的縮小等等的假面具之下，製造英美間戰爭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基本歷程都漸漸地袒露出來了！那是那個美國的巨人，他上前來了，他要求在資本主義的陽光之下得到一相當的地位。結果，他得到了，他成為其他的列強特別是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大不列顛的喉嚨。

歐洲在世界貿易中的成份在1913年是百分之六十四，在1926年是百分之五十四。歐洲成份的相當的低落雖然多少由於亞洲成

份的增加（它由 1913 的百分之十增至為 1923 的百分之十四，），其主要的動力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的世界的擴張。美國的喇叭雖然引起歐洲貿易的低落，可是一方面它却提醒了“歐洲的自覺”這種自覺在目下是被白里安與斯特史曼 (Briand-Stressnan) 的所謂歐洲合衆國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的宣傳很好地表現出來了。這種歐洲合衆國的運動，自從美國的海關稅率的增加成為了歐洲的喇叭以來，更形緊急了。因為要抵抗美國的海關稅率，聯邦的地位較之各個孤立的國家的地位是要便利得多了。歐洲合衆國的運動者屢次地宣言：他們的這種計劃的目的並不是在反抗美國。但是這種毫無價值的宣言，又有誰相信呢？它的發生是毫無疑義地由於日漸衰弱的歐洲和它的強憐——美國間的對抗。在最近的將來，歐洲的各國為了戰爭的目的必實行聯合起來這件事是很可預料的，因為如 *The Economist* 雜誌上所說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力量必不可避免地要使得歐洲各國成為較密切的政治和經濟的聯盟”。但是這種聯盟的發展並不會造成一個超帝國主義 (Super-Imperialism) 的歐洲合衆國，反之，它必定愈益地促進了對抗的增加，結果必定釀成第二次的帝國主義者的世界戰爭。

按照去年國際聯盟經濟部的計算，世界貿易總額較戰前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但英國的世界貿易却還不到戰前百分之九十。美國之所以成為英國的一個主要的敵人，在下面的事實裡是很清楚地表白出來了！在 1913 年的時候，美國製造品的輸出儘較多於英

國製造品的出口的半數；但在去年（1928）美國製造品出口的總值計達 534,000,000 銀，而英國的出口的製造品的總值共計 578,000,000 銀。

在許多市場，因為美國貿易的特別發展，致使鬥爭愈益激烈起來；結果是英美在世界市場的地位的完全倒換。在南美和遠東，美國的出口貨是奪了英國在戰前的領導地位的。現在我們只要看看中國市場，美國是日漸奪取了英國的地位的這件事，是十分的明瞭了。

在世界大戰的頭一年，美國的中國輸出的總值為 6,452,000 銀，同時英國的中國輸出的總值為 19,200,000 銀。當這“美洲的入侵”開始的時候，英國的資本家認為這只是一“偶然的失敗”。歐戰終了後，美國的地位雖然日見鞏固——美國在這時候的中國輸出的總值為 16,200,000 銀，而英國的總值為 15,600,000 銀，——上面的見解仍然是盛行着。1922 年的時候，美國的中國輸出稍見低落，而英國的中國輸出的總值却在 3,000,000 銀以上，英國的資本家就以為他們的那個“偶然的失敗”的學說快得到證明了。但在過去的四年裡美國的中國輸出是日漸地超過了英國的中國輸出了。這個很顯明的事實或許能使英國的貿易專家（Trade Experts）醒醒他們的迷夢罷！

美國不但在貿易的發展中握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牛耳，就是在資本的輸出上，也使老大帝國的列強感到非常的焦急。讀者只要想到加拿大和阿根廷，就很可明白英國資本家為什麼要那樣地對

於美國金融的輸入抱着憂慮。美國在 1928 年已經由 1914 年負債約 2,500,000,000,000 金元的債務者的地位一變而成爲 16,000,000,000 金元的債權者了。債款中約有 7,000,000,000 金元係代表官方的戰債。

不但在國外市場，美國的進展很激烈地動搖了大不列顛的地位，就是在英國資本家自己的帝國裡，因着美國的擴張而惹起的英國的衰落這件事也同樣發生了。

在 1927 年，英國的澳洲輸出是兩倍於 1913 年，可是在同年之中美國的澳洲輸出是四倍於 1913 年的。與這同樣的情形在南非洲也表現出來了。非洲輸入的英國百分率比較 1913 年低落百分之五。英國的加拿大輸出只佔英國總輸出的百分之 17；美國的加拿大輸出却是日日地增加，到現在，加拿大輸入的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四都是來自美國的。就是在紐西蘭（New Zealand）——這是向來，以其對於人口的比例說來，輸入英國貨物最多的領地，英國衰頽的現象也是很顯然的。在 1913 年紐西蘭輸入英國的貨物佔總輸入的百分八十二點四；但到了 1925，這種百分率就降至七十三。在另一方面呢。美國的紐西蘭輸出現在佔該地總輸入的百分之十七，要與戰前美國的輸出只佔該地總輸入的百分之九點五這個事實比較看來，美國輸出的大有進展是很顯然的啊！並且各方面的趨勢都表明着美國的繼續發展的可能，在 1913 年英國輸出到非洲殖民地——Kenya 殖民地及 Uganda 保護國——的貨物的總值爲 6,750,000 塔，到 1927 年輸出的總值就很快

地增為 16,500,000 銀。但是在這個地方，英國也同樣地遭逢著美國，德國和日本各國資本家的嚴厲地打擊。在 1927，由大英帝國的領域輸入的貨物只佔該地總輸入的百分之五十四。

大英帝國的市場的任何部分，只要你去考察的話，那種美國以英國作犧牲為前提而大大地擴張起來了的事實是分外的顯然罷？

由上面一般經濟情形的事實所作成的英國資本主義的衰頹，是如突來的急難，來到我們的統治者的面前了。為了克服這種急難，他們是用盡了千方百計的。今日的一個‘勞工’政府（A‘labour’s goverment）的成立，我們要曉得，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權力和組織的增長的表現，倒是資本主義日就衰頹的徵象哩！一個‘勞工’政府是資本家階級的最後的防備軍。現在同美國搶奪世界市場的鬥爭，是被勞工政府很澈底地很有力地實現出來了，這是一切的非勞工政府所望塵莫及的。

在國會休假的期間 J.H. Thomas. 代表英國的輸出貿易家到加拿大去鼓勵他們之反抗美國侵入的鬥爭。自從勞工政府成立後，一個商業的代表團就派遣到南美洲去鼓勵同樣的反抗美國發展的鬥爭。這個代表團收到英阿條約（Anglo Argentine Convention）簽訂的效果。但是這只是預兆着將來的更加劇烈的英美鬥爭。在現在，英美在阿根廷的鬥爭是非常明顯的，這是在下面的記載裡，很可以看出來的。在 1913 年，阿根廷輸入的英國百分率為三十一，在 1926 年為十九點三，而美國百分率在 1913 年為十

四點七，但在 1926 就增為二十七點四！再有什麼東西能有比這更明白的表白呢？

用了某種類似賄賂的方法，這個代表團從阿根廷政府中得到一種契約。這個契約規定：在兩年之內，阿根廷須從美國輸入價值八百萬鎊之貨物。此外，“勞工”政府又設立了殖民地的發展計畫。大量的金錢都借給殖民地的資本家，以‘只買英國的貨物’為其條件。它更變動了前度資本家政府的計畫，在世界名地方重新設置了商業的代表人。就這樣，勞工政府是促進了國家機製(State machine)與資本家企業的完全溶化了！“勞工”政府運用這種種方法以去戰取已失去的市場的時候，它四面所遇見的敵人都是美國。這個敵人並不是常以商業遊行者(Commercial traveller)和外交家來對付的。

我們在將來一定可以看得到，如同我們在過去看過了一樣，武器雖然變更了，政策是仍然繼續着的。今日勞工政府以救濟失業為名而建築的戰艦終會與胡佛(Hoover)的大加減縮(！)了的戰艦針鋒相對吧！

當作一個經濟單位的帝國

在“勞工”政府的種種拯救英國資本主義的企圖之外，將大英帝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而設立起來的這種計畫或許就是最好的救濟英國衰頹的方法罷？一位很負責的資本家作者說：

“大不列顛已經失去，並且永不能重新取得那種很可矜誇的

“世界工場”(Workshop of the world)的地位，可是，在另一方面，它還可以保留那種佔全世界約四分之一的聯盟國的“首府國家”(Metropolitan State)的地位。

這種把大英帝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在內部就實行自由貿易，對外面就豎起稅率的高牆以排斥外來的貨物的這種快樂的思想都是空虛的幻想。無疑的在下次的帝國會議中，這個問題必定是首先被討論的。不過，以我們的推測看來，這個會議除了將僅僅地顯示：英國的霸權業已喪失了的這個事實外，還希望它能有什麼作為，那是不可能了。那些領地誰都不願意爲了這首府國家的美好的企圖而犧牲了他們自己。

加拿大與美國稅率

那是實在的，美國稅率的增加在一方面促進了歐洲合衆國的運動，另一方面它又開展了英國的帝國思想。現在這稅率案(Tariff Bill) 尚沒有製成法律，並且反對這種稅案的在美國也尚有相當的勢力。結果，無疑的將是這議案的相當的修改。在上議院的財政委員會的報告中，關於這種稅案的真實的性質，我們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了。稅率的加增爲的是

“要促進這個國家在戰時的必要品的生產呀！”

特別的，在加拿大，美國的這個稅率案得到了它的反響。加拿大的保守黨，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認爲加拿大只不過是美國的生乳的母牛，現在正遊行全國很熱烈地宣傳着：“我們需要完全

的保護，更堅固的帝國的統一”在他們看來，美國的新稅率案簡直就是加拿大經濟生命的致命的打擊。在以今年五月為結止期的前八個月中，加拿大輸出到美國的農產品及麵粉較之 1911 年的五月以前的八個月中（在美國第一次為排斥加拿大的原料品而提高關稅以前）是要減少了 20,000,000 銀鎊的輸出的。（現在加拿大輸出到美國的麥子每 Bushel 須納稅一先令九辨士）並且行將在十一月實行的美國新稅率更將阻止了加拿大的 10,000,000 銀鎊的物產的輸出。可是同時，美國的加拿大輸出却非常的進展，這點在前面是已經說過了的。由這些事實所產生出來的一個附帶的產物 (By Product)自然就是日見緊張的“帝國的統一”運動。那當然是十分可理解的，加拿大的自由黨政府為了適應目前的需要，更增進了現存的英國製造家在該地所享受的特許權。但是這般“帝國統一”的運動家的計劃是不能完全成為現實的。加拿大，如同資本主義經濟的任何部分一樣，其本身就是一個複雜而難能解決的矛盾。這種增進英國製造家特許權的政策，即使能得到 West 和 British Columbia 兩地方的認可，可是它要想得到 Quebec 地方的贊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Quebec 的製造家現在正是處在和母國（！）競爭的危險中！他們曾不斷地要求政府去取消英國製造家在加拿大所享受的特許權！

我們只要記得美國在加拿大投資的增長，和變成大英帝國這一部分——加拿大——的瓦解的各種勢力，那末，“經濟的帝國統一”的不可能和英美競爭將日益激烈起來的這件事，自然是十分

可以看起的呵！總之，資本主義的體系是用了它自己的炸藥來炸毀它自己的！

社會民主政治的任務

“帝國的經濟統一”運動只不過是英美間日漸擴張了的競爭的反映，而且這種競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戰爭。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吧？就是僅僅因為上面這種事實，所以在這種運動的許多贊助者之中要發現了 Melchell 公爵，那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但是登在九月三日的 *The times* 報上的一段說詞却是比這更富於啓示的東西。在那天的 *The Times* 報上，緊挨着工人組合大會——資產階級的低級的組織——的一段報告，就是教會中要人的一封來信。這封信就是在告訴資產階級說：教會現在也正在努力於同樣的“帝國統一”的宣傳哩！工人組合大會是在 Belfast 地方舉行的。該會主席演說包含了下面的這一段記錄：

“我們必須如美國一樣地組織起來，我們必須在同等的程度上發動我們的富源；一個島國雖然不能有這樣的偉大的作為，可是一個世界共和國（World Commonwealth）是能够的。大英帝國較之美國是有了更大的消費。它有衆多的人口，廣大的領土，豐富的自然的財富。在這個和平而且努力和平的時代，我們是很少聽見關於國際間的經濟和平。稅率的高牆不但沒有拆毀，而且日日地高築起來。因此，我主張：目下的勞工組合運動應該極小心地追隨着一個大的運動——

將大英帝國當作一個經濟單位而組織起來的運動。”

這是多麼漂亮的資本家號筒的吹叫！而且是自 Tillet —— 上次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幕卒——發出來的。這較之 Mac Donald-Dawes 的假僞的聯歡是如何地更缺乏現實的意味？沒有過幾天，一個著名的保守黨員就寫了一封信給 The Times 報，讚美 Tillet 並且表示贊助他的“帝國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Empire) 的主張。共產黨對於這種帝國的社會化的主張，是抱着如何的見解呢？

那是一點也不會錯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政策，無論它是表現在 Snowden (電影片的標題上說：他把英國重新放在地圖上了。) 的工作裡或是表現在 Tillet —— 這是帝國的經濟統一運動者一一的努力中，其結果必定會把工人階級引到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屠殺中去！工人們要想從屠殺中救出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聚集在革命的領導者之下與帝國主義的“勞工”政府作激烈的戰爭，同時還要努力於“革命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並且還要誓死不要爲了帝國主義者的戰爭而將大英國共和國組織起來；反之，倒要破碎這個奴隸的帝國，給與在這帝國內被壓迫者以真正的獨立！

1930, 1, 11日，譯自 Labor Monthly

胡佛與麥克唐

Scott Nearing 著

山 夫 譯

胡佛與麥克唐，當他們完結了在華盛頓的秘密會談之後，發表了一篇聯合宣言，但這宣言的內容却與他們所會談的問題渺不相干。“我們的會談主要的是限於和約簽訂之後我們兩個國家的相互關係。因此，在一個新的而且是着重的意義上，這兩國政府敢於宣稱：在他們之間不但戰爭是不可能的，就是由於懷疑恐懼而生的不信任和疑忌以後也不能影響我們的國家政策”

這種“在這兩國之間戰爭是不可能的”的宣言是滿被資本家的報紙載了的，這無非是要鼓勵和平主義者的宣傳呵。但這也很顯然的是胡佛與麥克唐所十分需求的。然而這聯合宣言的真意義却並不在這兩帝國主義列強的和平意向的表白，倒是在於它的隱含的啓示：這隱含的啓示是什麼呢？就是胡佛與麥克唐的會談

並沒有解決了英美間的任何衝突。他們宣言更稱說：在我們之間的戰爭既然是排除了，那麼，英美兩國政府很樂意於在將來的談判時，去謀“舊的歷史的問題”的解決。換句話說，這些問題——這些沒有特別說明的問題是仍然沒有解決的。並且這聯合宣言更表示着：就是在海軍限制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都不是一致的。這個宣言說：

關於海軍減縮的兩方意見是十分一致的，在前次的會議中因英美意見不同而生的阻碍現在似乎是可以完全除去了。

然而宣言的這一方面是被一般報界所忽略了。美國的報紙從極端保守派的機關報如 Washington Post 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 New Leader 都同聲地歡呼麥克唐為和平的使者。這種聯合戰線，努力於和平主義者的幻想的宣傳，是一直維持到麥克唐離美之日才止。

當麥克唐抵美時，他是熱烈地受着政府招待委員會的歡迎。這個委員會包含了下列的這許多要人：社會黨的主席 Morris Hillquit；社會黨的大總統候補者 Norman Thomas；J. P. Morgan, Jr., Owen D. Young 以及其他主要的銀行家和實業家。一列海陸軍的護衛也被派遣去歡迎他了。在他的美國的居留中，麥克唐是受遍了大資本家的宴饗的。有一晚上，他是很光榮快樂地赴一個許多實業家和財政家都出席的宴會，這宴會是 Elihu Root 召集的。另一晚上，他更受 Thomas W. Lamont, J. P. Morgan 的宴請。

但在胡麥的聯合宣言發表之後，一般的報界就開始很公開地對於這宣言的空洞和曖昧表示不滿。保守派的共和黨報紙，在先前是和一般人同聲地歡迎這麥克唐的，現在又開始其攻擊的論調了。

麥克唐為什麼到美國來？胡佛和他的富豪顧問心裡都懷着什麼鬼胎，當他和這位英國首相秘密會談的時候？

最可讚美的解釋或許是這樣罷：美國外交當局想間接地給與凱洛公約 Kellog Pact 以更大的効力。當然的，凱洛公約一定是所討論的許多主要問題之一。

‘由懷疑與恐懼而生的疑忌和不信任，即使他們在這和約之前是認為正當的，以後也不能影響國家的政策。’這是麥克唐和胡佛在他們的聯合宣言裡說的。並且在這同樣的宣言中，還有下面這段話：‘鑑於凱洛公約所給與的保障，我們能够終止，我們永久地相信，軍艦的競爭的建造，這種軍艦的競爭建造是常陪伴着戰爭的危險與國家財富的耗費的。’在這宣言發表了兩天之後，麥克唐更說：‘凱洛公約是許多基本事件之一，在其上，種種制度的大規模的構造可以建築起來。’

為什麼美國的政治家想擴大凱洛公約？這無非是想藉此而建造起一個為美國所統制的世界機關，以便與國際聯盟相對抗。

美國是從沒有加入這國際聯盟的。國際聯盟的政策只是受英法的控制。這個國際聯盟在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看來，簡直是他們的世界企圖的最頑強的阻礙，他們將怎樣對付這阻礙呢？這只有

在世界的門羅主義的形式中建造起一種有力的對抗的組織，而凱洛公約即其機契。

英國代表極力主張：將於 1930 年一月在倫敦舉行的五列強的海軍會議必須是一種初步的或試驗的會議，就是說它必須是只作為國際聯盟開的一個預備會議。Arthur Henderson 在他的召集會議的文書中，也極力伸說這一點：

我很願意地申明：敝國政府並無任何意向建設新的機關以討論海軍軍縮問題。反之，這倒是很希望的：由目前的這個會議整理出一個完美的計劃來，以便於國際聯盟預備委員會以及以後一般海軍軍縮會議的工作的進行。

法意兩國在接受英國的通知時，也極力伸說 Henderson 文書中的這一點。美國的回答却放却了這一點。同時政府的機關報 Washington 以及其他報紙都繼續地鼓吹凱洛公約。一般的謠言更喧傳着：國務卿 Stimson 正在尋求某種方法，這種方法能使他在他的一般策劃中能得到參議院的贊助。

第二種可能的解釋是如下面所顯示的。自從 1928 年英法海軍協定公佈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很顯然地在於拆毀這帶有恫嚇性的聯盟。但是英法聯盟的破裂即是意味着英美聯盟的繩結嗎？

“不”麥克唐在紐約，十月十一日，這樣很有力地說着。“兩個國家”他說，“是不能造成世界的和平的。”然而法國的報界却認麥克唐的赴美是英美聯盟的預兆，法國政府也開始向意大利求援了。所以這件事在國際政治局面裡倒惹起一點小小的波瀾。

此外還有一種胡麥會談的解釋：胡佛現在自然是很滿足啊！他和他的雇員都很十分明瞭那種可怕的經濟的壓制，這種壓制是被美國的統治階級加於英國的統治階級之上的。他們只須靜候時機；美國的壓制將年勝一年地緊張，而英國的地位也將年比一年地難於忍受。

這件事是十分一定的：英美間的經濟戰爭是一日比一日地厲害起來。英國的工商業委員會在它的“海外市場的觀察”（Survey of Overseas Markets.）的報告中，記有下面這段話：“美國是所有為英國所生產的各種貨物的可怕的競爭者。”不僅此也；美國的投資的力量也日日地增長起來；有效力的商船的建造也較前更加注重；英美間的石油和橡皮的……爭奪也日益明顯起來；這兩個偉大的資本主義帝國爭搶這世界經濟霸權的情形宛如一幅活現的畫圖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英美的競爭現在已經終止了麼？沒有。麥克唐的赴美僅不過在這競爭的外面塗上一層透明的油漆罷了。不管他的言辭多麼漂亮，他在由英啓行時，他的失敗的運命就註定了；被競爭的經濟的力量註定了。這點，胡佛是最侵陵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證實了的代表者；而麥克唐却用了和平主義者的虛幻的言辭去遮蔽英國帝國主義的猙獰的面目！

“當物質作用在我們的感官上，產生出感覺。感覺依存於頭腦，神經，網膜等等，即依存於以一定方式組織起來的物質中。感覺，思維，意識是物質以最精密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產物。這就是普遍的唯物論，與特別的馬克思和昂格思的教訓”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現代經濟學講座

河上肇著

江漢譯

第一講 辩証法的唯物論

- 一。引言——戰取辯証法唯物論底必要。（本期揭載）
- 二。當做被壓迫階級哲學底唯物論。
- 三。什麼是唯物論？
- 四。辯証法底本質
- 五。唯物史觀

一、引言——戰取辯証法唯物論底必要

- (1) 經濟學為什麼是我們革命精神的武器？
- (2) 一般的公式理論和牠具體適用的——真理常常是具體的——戰線統一。

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是建立在當做普羅列塔利亞哲學底辯証

法唯物論底基礎上的，所以我想在講經濟學之前，先把關於成了牠的基礎底哲學略加說明。

想這決不是無益的。例如在階級鬥爭上，我們的實踐爲什麼必須經濟學的知識底問題，——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經濟學底當面的問題——關於這種問題，我想能够給一明瞭的解答的，也就是辯証法的唯物論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在高畠氏的譯本，分爲一圓本五冊，其頁數，就以充滿字數不容易讀的一圓本看來，第一卷尚有七百六十七頁，第二卷四百八十頁，第三卷八百四十頁，合計約千七百頁。馬克斯有句話說：“我們的學說不是獨斷的，而是走向行動的指針”。立在這樣見地的馬克斯，爲經濟學遺下了這樣宏大的著作，這就是因經濟學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解放中所不可缺少的基本的而又最主要的精神武器。那麼爲什麼經濟學竟當做那樣重要的精神的武器呢？這也祇有唯物論的哲學來說明。列寧，是在馬克斯完成了這種事業以後出世的，他自身沒有再從事同一工作底必要，可是當他剛滿十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熱心地讀“資本論”並且以後勸告我們說，“請反復地讀資本論第一章”，他自己也把“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的大著作出版了。在日本還沒有充分地理解爲什麼經濟學是我們解放運動上基本的精神的武器。即現在標榜馬克斯主義底知識階級的人們也有不少沒有完全讀過，“資本論”的，像這樣的人決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有一次恩格斯在他書信裡曾有如次的話：

— “近來利用唯物史觀來當做不研究歷史爲口實的同志們也不

少的跟着起來了。馬克斯辟易七十年代，法蘭西的自稱馬克斯主義者們曾說：我祇知道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現在完全是這個樣子”。

如果把這話應用到現在的日本，我們就可以這樣說吧：近來在日本以馬克斯主義或列寧主義當做不研究經濟學爲口實而利用的人們太多了。不好聽些說，口裡祇說研究經濟學底必要而自己一向不研究經濟學的人們太多了。如果這樣的人們都自稱是馬克斯主義者，恐怕馬克斯就要說“我情願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吧。如果這種狀態還存續着，那就祇是辯証法的唯物論底言辭流行着，而辯証法唯物論底本身決不是徹底的，我們可以這樣地證明。在研究經濟學之前，首先想把辯証法的唯物論底大意，盡量平易地加以說明，我這種企圖，想決不是無意義的吧。

若不明瞭這種哲學的基礎就不知道爲什麼經濟學是我們基本的精神底武器，同時也就不知道運用這種精神武器的方法。在這裡祇是因為這種武器越是有力量的東西，如誤解其應用方法，就越受到他的害處，因此若不理解牠的運用方法，在我們的實踐上對牠本身就生出是否能實用的疑問來。從來，經濟學基本理論被人輕忽，這就是其原因之一。引言雖然長些，但是因為這是重要關鍵，我想還是再加以說明。

例如，“資本論”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爲研究底對象，但是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又“資本論”是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立，發展，並沒落的諸法則，但是這些法則都是一般的法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具體的各個情形上就成

了不完全的東西。因此把這種概念的法則當為唯一的標準來處裡實際問題，這個人必定陷於觀念論的污泥中，終竟拔不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要想研究經濟的一般理論時，必須要特別地領會：一般的理論是關於了解其大體上所必要的東西，不待言這是極其必要的，然而這祇是關於了解大體底一般的理論，在種種雜多的情形上都能同樣底應用的抽象理論。牠的當然的結果，是當解決某種特殊的具體問題上，就都是不充分的。所以馬克斯主義者常常說：“真理常是具體的”。公式似的一般理論固屬主要，但是不可拘泥牠的一方面。在解決具體向問題時祇標榜公式的一般理論是不足的，必須把這一般理論來實際地應用于事物上。無論什麼時候，所謂一切可以勉強適用的萬能藥方，在馬克斯主義中是沒有的。公式的一般理論不過是為我們接近具體真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公式似的，抽象理論的本身決不是真理的本體，祇有把這種公式理論來特殊化了的具體的理論，纔是真理。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斯主義是敘述一般的理論，同時不絕地高唱着：“真理常常是具體的”。

因為我想把這抽象和具體，普通和特殊辯証法互相的關係來說明清楚，在活用一般的普通的公式理論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再進一步來討論它，然而祇說抽象的話怕大家不好了解，所以現在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其一 是列寧對於俄國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底意見。諸位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以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底衝突來說明這種革

命的。詳細說來就是在資本主義底生產諸關係之下社會生產諸力漸漸發展起來，這恰如小孩子長成爲成人，舊衣服對他不合適一樣；原來存續下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成爲時代後的東西而必須換身新的衣服過了。但是，如果依據這個公式理論，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俄國那樣生產力發展落後的國度裡較他先進諸國反早著成效就不對了。假如把公式理論原樣地適用就不由要這樣的疑惑。所以如果列寧祇主張公式理論而不顧其他的議論，他夢也夢不到在俄國會實現了那樣偉大的事業。然而他把這驟看好像是和公式理論相逆的東西在俄國主張了。在“德布林”的著作（河上譯“列寧的辯證法”二四頁）裏，關於這層有如次的話：

“普遍的發展的原理不是由特徵——牠自身是以普遍的法則性底表現而成的結果——被否定被排斥的，反是由特徵變化而成的東西，這就是如列寧所說造出普遍發展原理底形式或樣式的一特徵。這樣非常深刻化的辯証法問題底處理使列寧作出這驟看好像奇怪的命題：他說，在俄國生產諸力底發展程度決不是形成對於俄國革命的評價上的最高要因。”

因為生產諸力底發展程度不是革命的最高要因，所以這好像正是馬克斯主義一般理論的倒逆，主張這樣倒逆的，是不是反叛馬克斯主義呢？

正和這個相似的事情在現在的日本發生出來。大家都知道，目下日本關於新勞農黨底樹立，在一部分的人中起了強烈的反對，這反對論主要的根據就是說：普羅列塔利亞特黨祇能有一個

的；這樣一種公式理論，正因為普羅列塔利亞黨祇能有一個，所以要組織別的獨立的合法政黨，無疑的是對馬克斯主義的叛逆，這就是反對者的根據。

把以上所說的，一是在革命當時的俄國，一是在現今的日本，兩種實際的具體問題浮在腦子裏，我們來考察一般的公式理論和他的具體應用底關係吧。

因為我要把這個問題盡力地冷靜來思想，所以提出一個同我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一種自然現象來考察。

一般的理論和他具體的表現底關係，比做川流來看，就容易明白了。例如，地球上一切的水都是向海裏流的，這就是一個公式的一般理論。現在，京都的賀茂川，大阪的定川，和其他日本各地的川，以及中國，印度，乃至歐洲，美洲，非洲等等一切的川都沒有例外，盡都向海裏流。所以地球上一切的水都向海裏流，這就是一個公式的一般理論，無疑地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公式理論不過是指示出結局底窮極目標，所以我們拿具體的某一個川來看，它決不是一直線地向海裏流的。例如，一定的川向一定方向流行時，假若遇到凹下的深谷，水就非先填滿了這深大的凹地後，是不往任何方向流動的，後面流來的水也都停滯於此凹地了，直到這深大的凹地充滿之後，才開始向一定的方向流去，並且這水雖然已經向着一定方向流出了，如若遇到大山當前，海雖說橫在南方，但不得一直往南，有時就向東轉流或向西轉流，甚至雖然從來是一直向南方，但須衝出這種險

惡，經過了幾十里的道程，就不得不向北流，即向原流的反對方向逆流，這種特別情形也是有的。如果祇就現在的情形來看，好像是川不向海裡流，而反倒背海而流，但實際上祇是一時中止南流而向北流吧了。所以在這時候，川的構成分子中假如是些祇認得公式理論而不能變通的分子，那就必定引起大問題了：我們不可不向南流，向北流，正是對於已經說過的大方針底倒逆，這樣議論是應該發生的。但是這時假如正面有大山屹立着，向南流終究是不可能的時候，而一時的向北流，却發見他們的出口，這就是爲不久南流入海的唯一方策。在這個意義上，本來向南流的川雖然一時向北流，決不是破壞理論；但不是公式理論毫不變更的應用吧了。列寧不以生產力的發展當爲革命最高的要因和馬克斯主義底一般理論正似相反，然而主張俄國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是革命底最高的要因，却恰和這個情形相似。在某一時期某一地方川之往北流實際就是南流入海。這就是把公式理論適用到它的特殊事情上，而活用於具體的事物上。在辯証法上，特殊就是普遍，普遍就是特殊。所以我們要把握住黑格爾所說“個別的東西就是普遍的東西”那種辯證法。並且也就可以明瞭亞里斯多德所說，“在眼裏要看到家以外的家「一般的家」是不存在的。”實在說，祇有抽象的一般理論才是具體的，所以祇有這樣被具體化的，才是真理，才能適用到我們的實踐上。

我想在這裏把一般的理論如上面所說的活用到具體事物上，但是我國直到現在還沒有充分地實行，這就是無產階級戰線在馬

克思主義之下不能統一的一個主要原因。

大家都曉得，現在無產階級的戰線弄得四分五裂，以致我們的戰鬥力非薄弱，這是任何人都視為遺憾的。現在要把這四分五裂的狀態統一，祇有真實地理解馬克斯主義底戰術。在分為種種各個流派——社會民衆黨，日本大衆黨等等的諸流派一上，這數量一定的大衆之所以屬於牠的，是因為無論那派都必須有容納大衆現實的理由。這恰和前面所說的川流一樣，為適應種種地方現實的情形，就不得不向東西南北各方向去流。所謂一切的川都流入於海，在窮極的目標上就相當於無產階級的解放；但是像上面所說川是不能一直線地向海裏流的，所以現實的情形也就不得不向東，向西作種種的迂迴曲折。在這時候，若有自稱為馬克斯主義者指着只有一直線地向海裏流是正當的，而一概排斥其他諸流派，這無疑地是犯了急進主義的幼稚病。但同時這東西四流的川流要是忘掉為現實的條件所以不得不走這樣的軒路，毫不注意現實諸狀態，祇管往東西流時，這又完全是迎合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解放的大目的，與上述急進主義幼稚病，同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敵人。但在這裡最緊要的，就是那怕這樣窮極的目標不被明瞭地意識着，祇要在實際上如像川流不間斷地往低地流，“日常的鬥爭”真實不斷地實行著，在結局上所當做的大體方向仍然是向南的。若是勞動者為他們日常的利益真正地繼續爭鬥，那末在他鬥爭的過程上，也就不得不不是向南的。勞動者階級就是負起歷史使命的階級，這是必然的。所以馬克斯主義一般的

理論即不外在結局上指示大體的方向。我最近看到大阪勞動總同盟分裂時，本山氏的聲明書，就諒解在這裡所主張的現實主義本身，至少從我的立場看來，是不應當完全反對的。真實地增進勞動階級利益的人們，我們應當和他們同一歸趣，現在我們相信正是向同一方向進行着。從馬克斯主義的見地看來，在以上所說諸流派中如故意抑壓大眾日常鬥爭的指導者是有排斥的必要的，但是不斷地為大眾本身要求果敢的日常鬥爭卻毫無排斥的必要。所以若是真實地理解馬克斯主義的戰術，把東西南北，向一切方向的諸流派在日常鬥爭過程上都統一在同一戰線上，那末在結局上就能最確實地而且最迅速地把一切的水都流入海了。真實被理解的馬克斯主義底戰術，就是必須把所有的流派都奧伏嚇變 (Aufheben) 而統一在辯證法上，實在說，並不是種種的流派全都當做無用的東西一概排斥出去；而是必須接收這些正確的部分把牠引揚到更高的東西上。黑哲爾所用德國語 Aufheben 一字，從來在日本都譯做“止揚”，福本氏則把牠改譯‘揚棄’，因之使用“揚棄”的很多。但是原來 Aufheben 的意義至少有以下三種：

- (一) 中止 廢止 破棄
- (二) 高 揚
- (三) 賽存 保全 包容

黑哲爾 Aufheben 一辭把這些意義都包含了。“止揚”也吧，“揚棄”也吧，總之，不是一兩個意義的表現：在黑哲爾派，若說奧伏嚇變某東西時，本來並不祇是拋棄這東西，而是說把牠保

全而且高揚他底意思，例如馬克斯奧伏赫變了黑哲爾的辯證法，這就是說，改正黑哲爾辯證法的錯誤地方，而把牠引揚到更高的東西上。在這時候，關於黑哲爾發見的辯證法運動諸形態底正確的認識，都已收容在馬克斯的辯證法中。普羅列搭利亞是奧伏赫變現代社會者，但同時却不是說把現代社會，和在它上面發展的生產諸力全都廢棄，不用說是把完全都接收過來給它以更高的發展餘地。就是在批判某種議論時，祇管說對方的議論怎樣誤謬，把人家罵倒了是不够的，必須把他的批判行使辯證法那樣的公式才成。在後面我要述說意識不外是一切存在的反映，但要說無論怎樣的意識不拘在什麼地方都反映存在，那又是錯誤了，這種錯誤是由於有的祇反映存在的一方面，有的好像在照像匣上物體之反射一樣倒逆地反映事物。所以如果批判這種地方有某樣的錯誤時，他的批評須持有積極的內容，同時不得把被批判的東西完全拋棄，而應由更高的立場把牠高揚。就是無產階級底戰線統一，也不外以這種辯證法的方法來統一。

關於以上這點，列寧有幾句話是很值得注意的。（“選集”德意志版，二八一頁）。

“馬克思主義必須顧慮全體的具體的形象，必須認清無政府主義（指急進主義的幼稚病）和迎合主義底限界，並常常要理解牠這樣的限界是相對的，可動的，可變的，然而牠確是有。”

馬克思主義的戰術和其他諸流派的方法底境界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動的，不是不變的而是常變的。所

以在這方面是進急主義的幼稚病，在那方面是迎合主義，他們的分歧點不是用鐵骨三和土牆壁隔離着的。然而真正馬克斯主義的戰術和其他諸流派戰術底分歧點，究竟在那裡，不是任何人一看就立刻明白的。那末，這區分點沒有的嗎？不，那是有的。像這樣融通無阻的，就是馬克斯主義的戰術。

在我譯的“列寧的辯証法”中關於上點有如次的敘述。在序文裏我們把牠高聲地朗讀吧：

列寧是個辯証法論者，他常常要求得到能够研究現象底具體方法。抽象的真理不是真理，真理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具體的。

“馬克斯主義在特殊的特性底諸契機上都含有重大的意義，因此我們要把這樣的特性調合在普遍上和法則性上。列寧把特性及普遍的辯証法和他內部的聯繫以及他的區別和對立性都完全理解了。

„由辯証法本身取出特質來處理辯証法這種能力，在我看來，實在是一個理論家和實行家的列寧的權威底源泉。其他的馬克斯主義者對於社會生活的種種問題，祇是把關於會生活的發展法則馬克斯學說原樣拿來千篇一律反復的論說吧了；反之列寧則立腳於普通法則性底認識上，不斷地觀察在某一時代或同一階段同一時期底諸現象底特質，並且依着這種觀察去把握在現象之連續上最重要的特殊之環——這環就是在所給與的諸事情上普遍的本質底一樁契，而表現普遍本身底東西。因此特殊就是辯証法上的普遍，普遍也就是辯証法上的特殊。所以我們知道列寧是反對那固

執抽象真理基礎的馬克斯主義者，而建造一個具體的真理底基礎。

“祇有否認在自然和社會上有‘純粹’現象之成立的，才是辯證法的法則。……列寧說過：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上‘純粹’的現象未曾發生過，而且也不能發生，這是真正馬克斯的辯證法……所教訓給我們的。因之，‘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世界上未曾存在過，而且也不能存在。在這裏常常存有封建制，小市民制和其他的一些遺物……”

“應用在歷史上（也是自然上）的辯證法是以普遍的發展原理和法則作前提，而把那個特殊——就是牠實際上雖然是錯雜在普遍的法則性裏面，但在具體的統一上形成非常重要的契機而對於這種具體統一底把握演着重大脚色的東西——所有的特性底意義要在辯證法上去考慮。在這時候須要記牢的，就是普遍法則性本身，在具體的情勢上是經着某種轉化的。由此，對於現存‘環境’特殊諸關係底全系統法則性的依存就明白了。如果不顧慮具體的諸關係而引證普遍的法則性，不可避免地會把我們導入形而上學抽象的結論上去。”

“祇理解普遍的法則性和世界史一般的發展原理，是不充分的。馬克斯關於那社會發展底法則和資本主義中社會主義一般的傾向底法則之學說，是所有普羅列塔利亞政策底基礎，不消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但祇就這些仍是不够的，我們必須真實地親自把馬克斯革命的辯證法應用在歷史發展的各階級上。因為在具備具體的內容上豫見階級本身和牠的一切特徵，是誰都不可能的。”

書報介紹及批評

曉 香

一、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問題

(蒲列哈諾夫著，英譯本一九二九年 Martin Lawrence Ltd. 出版。價五先令)

如不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則已，如要研究馬克思的哲學基礎，那我想這本書是最值得介紹的。雖然蒲列哈諾夫當歐戰爆發時叛變了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即布爾希維克的前身），而變成社會愛國主義者，但本書是蒲列哈諾夫（一九〇八年）筆鋒最健時代（也是最後的）一部傑作。當俄國經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當時國內反馬克思的著作盛極一時，這本書就是社會民主黨對這些反動思想潮流鬥爭的一個反映。蒲列哈諾夫開展出馬克思主義當為一個整個的哲學，一一般的宇宙觀。由反對這些改良派及公開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問題明瞭。

出來了。李阿薩諾夫教授在序中說：

『蒲列哈諾夫一方面努力地創造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用新方法研究當時俄國運動的具體工作，檢驗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一方面又要從事各種實際活動，而還有時間能細心地考察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集中他的注意力在哲學史，文化史與藝術史上。』
(見李阿薩諾夫序)

蒲列哈諾夫展示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辯証法，這種哲學不僅是勞動階級鬥爭的哲學，實在是工人們革命鬥爭中勝利的武器。

本書先敘述馬克思與昂格思哲學的根源，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底統一是費爾巴哈哲學的基礎。與唯心論相對立，這是一種存在決定思維，而不是思維決定存在的統一。馬克思擴大而深刻化了費爾巴哈的結論說：人在對物質的關係上，先要經驗到，感覺到而後思維。所以費爾巴哈主要的缺點是他們“觀察事物，觀察真實，觀察感覺的世界祇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以具體的人類活動，不以實踐的主觀的形式之下來觀察。”其結果，如蒲列哈諾夫所說，“費爾巴哈的觀點以為我們自我認識一客體僅由展示自我於客體的活動上；但馬克思却謂自我認識客體是由其對客體發生反作用才認識的。”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上說：“他憑這個活動，作用于那在自身外部的自然，一面變更自然，同時又變更他自身的性質。”(第一卷一三三頁)。這一句話立刻就擊破那支撐今日布爾喬亞

意德沃羅幾的說法以爲我們要改變人類的性質是不可能的俗惡論調，以及說馬克思是把歷史看做一自動進程，而人類之努力毫無作用的這種定命論。所以蒲列哈諾夫說辯証法的唯物論是行動的哲學，但他又指出這是『馬克思與昂格思形成他們宇宙觀那時期激動着社會的心境底反映，因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近在目前了。』現在，辯証法的唯物論更加是行動的哲學，因我們的時代是世界革命的時代了。

蒲列哈諾夫在一節上展示出馬克思如何發展出費爾巴哈『不是思維決定存在，反是存在決定思維』觀念而變成唯物史觀的基礎。蒲氏再說費爾巴哈不能利用黑格爾唯心哲學中的辯証法，但辯證法應用到實踐生活的焦點問題上是革命的哲學，賴有辯證法我們知道萬物無論在自然界或生活史中的進化不僅是平和的和遲緩的進程，而同時還有一種突變，由量變成質的飛躍，一種繼續不斷的運動，在這運動中萬物不斷地形成，變化，我們必須着眼在『他們的關聯，運動，現形與消滅』上。在一節上，蒲列哈諾夫檢討唯物史觀，論述地理的因素對於生產力的影響，以及社會關係（雖其自身係生產力的結果）對生產力發生的反作用。他把這個方法應用在社會的上層建築如感覺，幻覺，思維方法，藝術與音樂上，不過這里他警告我們不要陷入這種粗俗或公式化的危險中，以爲經濟生產力與藝術或哲學觀念的特別形相是完全成一種直線的關係；這決不然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常常有直接的衝突，常有類似不可解的矛盾。蒲列哈諾夫着重地說這種關係的研

究正在開始，所以這是不可能的，要希望立刻解決一切困難，發
現出偶發現象與現存經濟條件間相矛盾的因果關係，不過唯物史
觀使我們較之任何觀念論都能克復這種困難吧了。

在下一節蒲列哈諾夫討論自由與必然的問題。昂格思在他『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上說：『當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手
段變成社會的公共財產，當社會按照人們底需要而生產，當人們
由社會組織的主人而變成自然及其自身的主人時，于是人類將由
必然的王國一躍而至自由的王國。』蒲列哈諾夫在最重要的一節
中說，如近代的康德主義者，他們不相信有所謂突變，他們也不
會看到思維和存在的結合，而當思維是離開存在而獨立的，當然
不會見到這種飛躍是可能的。

蒲列哈諾夫引馬克思自己的話來終結：『人類決不能解決他
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作結論說：

『從理論的立場看來，這句話不過是主體與客體合一的觀念
應用到歷史進化行程一種新的說法。從實踐的立場看，這是最後
的目的終于要達到的雄偉而沈毅的信仰。』

如蒲列哈諾夫在本書卷首所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整個的
哲學，一包括生活各方面工人階級的哲學，所以那許多接收牠的
經濟理論而想把牠基立于資產階級哲學上的人們是不了解思維與
存在哲學基礎的一致性的，不了解『不是思維決定存在，倒是存在
決定人們的思維』，更不了解『作用于那在自身外部的自然，一
面變更自然，同時又變更他自身底性質』這種事實的。

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正在沒落的過程中，以這些話做指南，我們可以看見工人面前革命的必然將轉變為自由了。

二、第一國際史

(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Eden And Cedar Paul, 美國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出版：每本定價美金二元九角八分)

這本書是敘述第一國際歷史最明確而詳盡的一本書。從前，關於第一國際的介紹雖也有過 Postgate 的“工人國際”與 R. P. Dutt 的“二國際”。但前者不過在薄薄的一本一百二十五頁的小冊子中專門講到第一國際的僅有八十三頁，後者又不僅是敘述第一國際而是兼及第二與三國際的。斯克洛夫在原書序中說：

『從前對於國際的歷史有一個大綱的敘述的書籍，無論在俄文或在別的文字中都不會有過。至多，我們也祇有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海牙會議)的第一國際史——但對於在這時期以前或以後的無不完全被忽略了。我們即拿 Gustav Juekh 的通俗本說吧，這本書關於第一國際在一八七二年以後的活動就一句也沒有提。所以這是毫無足異的著者完全沒有提及國際中無政府派的歷史，因為無政府黨之主要發展是從海牙會議以後起的。關於這題目說得最廣泛的終要算 James Guillaume 的書（國際，文件及備忘錄）共四卷。但第一：這本書是含很強烈的巴枯寧色彩的。第二，牠在嚴密的意義上不能說是一本歷史的著作，而只是許多漫

無系統的材料之搜羅與收集而已。』

斯克洛夫原來計劃做一部完整無缺的工人國際史，所以對於第一國際以後的發展一定還會有第二卷的出版，不過本書亦自成一卷，正如資本論第一卷之自成一卷一樣。本書第一部敘述國際的前驅與國際工人協會史至海牙會議之破裂（一八七二年）為止。第二部敘述海牙會議與馬克思國際之衰落，巴枯寧國際之活動直到他的死滅為止。

三、俄國經濟的發展

（M. Dobb, *Rus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英國出版，價十五先令）

丹布氏 Maurice Dobb 係研究蘇俄經濟的專門學者，現任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座，本期王果君譯的蘇維埃經濟的五年計劃，即他最近在勞動月刊上發表的文字。介紹蘇俄經濟的現況的，雖有不少書籍，但都是零散的或平面的敘述，要有系統地從俄國革命後敘述俄國經濟的發達的，這本書還算是最新穎最充實的一本。本書內容共分十二章：（一）政治的背景；（二）起初八月的經濟政策；（三）經濟衰落的過程；（四）『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五）向新經濟政策的推移；（六）重建的開始；（七）產業組織的新形態；（八）一九二三年“剪子式”的危機；（九）“剪子”危機的終結；（十）固定資本問題；（十一）城市與鄉村；（十二）經濟的概觀。

這本書現在還聽不到有人翻譯，我們很希望中譯本能早日出

世。

(四) 新英譯資本論第一卷

(Eden and Cedar Paul 譯，英國由 Allen and Unwin Ltd. 出版，價十二先令六便士，美國由國際出版部出版，價三元七角。)

最近有幾位朋友來問我：『要買英譯資本論，到底買那種本子——新譯本還是舊譯本——好呢？』現在我在此負責回答一句：『新譯本較舊譯本好。』也許有人說舊譯本（莫雷與愛勿林合譯的）是經昂格思校訂過的，恐怕更可靠些呢。但那是不正確的觀察。第一因為舊譯本雖經昂格思親自訂正過，但昂格思訂正英譯本（一八八六年）後，當德文資本論第四版出版時（一八九〇年）又會把原文改訂過一次，即內容之排列亦有修正，如第八部“資本之原始蓄積”歸併為第七部中之第二十四章；而第二十四章第五章，與第六章合併為第四章“貨幣之資本化”中，而原有的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合併為第二十四章中之八節；而原有的三十三章則改為二十五章。但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更變；此外，昂格思並根據法文版（經馬克思親自校訂的）及馬克思的手稿，對於德文原本略有校訂之處，有許多地方因歷史條件的變動而須要改正的，昂格思也加上註解。這是德文第四版本身好過第三版的地方，保羅的新譯本即根據昂格思最後修正之第四版譯的。第二，即就新英譯本的自身說，也是較舊譯

文為忠實信達，第一新英譯文使我們容易閱讀，文字不若舊譯之艱深生硬，再凡德文資本論中所引用之外國語（如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都一一翻譯做英文了，不似舊譯本概依原樣搬過英國來，一個不譯；這對中國讀者是非常不便利的。這還僅就技術方面而言。實質上，兩譯本雖無本質之差別，但舊英譯文是有許多誤植和不適譯之處的（即對舊譯本最崇拜的李阿薩諾夫也承認說『誰也不能保證舊譯文沒有錯誤——見勞動月刊第十一卷——而沒有改正之必要』），新譯本呢，至少在各方面都比較滿意些（如提示我們價值形態，即交換價值，以與價值之實質 Substance of Value 底區別，以及馬克思術語更正確的翻譯）要一一舉出例來是不勝舉的，讀者祇要二者一對照，就可以知道了。至少，至少，新譯本與德文資本論第四版可以說是毫厘相稱了，『信達』二個字是無論如何做到的，李阿薩諾夫指摘出新譯文的五處錯誤，（原文見勞動月刊，中國新思潮上也有介紹），其實也祇有一個字是確實錯了的，即英譯五百五十頁的製硝皮廠 Tannery 是為學習的工廠 Factory For Learning 之誤。不過，這也不是保羅的誤譯，而是德文資本論的誤植，但錯誤終是錯誤，保羅已承認在第二版上改正了。不過，小子卻在新英譯資本論中發見出李阿薩諾夫教授也不會發現出的幾個小錯誤（說是筆誤更正確些）那就是在該書一百〇二頁第十五行上有一個 Diminishes 應該是 Increase；還有在四百三十七頁第九行上的一個 not 是贅疣，應該沒有的，這的確是錯的（我拿德文本對過），不過我相信這

也許是刊錯，決非譯者之誤譯。

Eden and Cedar Paul是世界著名的馬克斯主義者，除譯資本論外其他譯著甚多，即本篇所介紹的幾本書，除“蘇俄經濟發展”原本係英文外，其他二者亦係他們二人所翻譯，所以他們的譯文，我們可以絕對地相信的。

資本論，尤其是第一卷，乃全世界空前偉大的著作，勞動階級寶貴的經典，革命鬥爭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得到這樣忠實的翻譯，也是值得的了。但不知中國幼稚的出版界何日能有這部偉著的中國裝出現呢！嗚呼哀哉！

雖然，這僅就新譯文的方面言，舊譯本當然有牠本身的價值和地位的，這我應該鄭重申明。

（作者附：新思潮上有李一泥君一篇文章，說新譯本價值太貴，在中國要賣九元四角大洋，並跟着說讀書也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這原來是的，你看我們貴國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精裝本要賣三元六角（？）陳豹隱的經濟學大綱要賣二元五角（日文原本內容多一倍，祇售一元），書賈們借着年來對社會科學的需要而大發其財的營利主義真使我們哭不得，笑不得。但說新譯資本論較舊譯本貴，這層却是李君的誤解，因並非原書賣得貴，實在是金銀比價的變動，金貴銀賤的結果，因為我在去年正月買到一本，便只化六塊四毛錢呢。）

“布爾喬亞氾已經在法國與英國奪取了政治權力。此後階級鬥爭無論在實際上或理論上，愈加取着公開的威嚇的形態。牠敲響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喪鐘。到現在經濟學家已不再問這個學說是否真實，而祇問這個學說對於資本有利呢還是有害，有便利呢還是不便利，或問他是否觸警察的忌諱；這些成爲問題了。御用論難的攻擊代不顧利害的研究者而興；無偏見的科學研究匿跡而代之以惡意的卑劣的辯護士了。”

——資本論序文——

編 後

這期的稿子在一個月以前便收集好了，但因我們幾個窮小子，窮得只剩有吃窩窩頭的錢的，一時經濟湊不過來，眼望着他不會出世便要流產，想把幾篇稿子拿去賣錢吧，又覺得實在可惜，而且上海大雜誌是模型的資產階級的代言者，這種稿子收也不會收的。幸而，因燕山書店熱情的贊助，答應替我們印刷兼發行，此後決定每月出版一期，于月之十五號與讀者見面，這非但我們的好音，也許是讀者所樂聞的罷。至于這一期的內容如何，我們坐後台的人自己叫好是不必的，還是請讀者公平判斷去吧。不過，我們這個雜誌不是迎風四舞的八面美人，要是有的讀者覺得不適合他的脾胃時，我們祇有借馬克思在資本論序中的話來回答他：

“Seq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幹你的吧，管他們說些什麼！）

因為在今年一月便收集的稿子，預備二月初出版的，所以有誤

譬如：海牙會議，法意的海軍衝突，五年計劃與農民，軍縮會議等精彩的文字或因時期已過而變成明日黃花，或因篇幅的關係都臨時抽去了。一九二九年第三季的世界經濟第二節“獨占問題及「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學說”也已經譯成的，本想與第一節同在一期內登完，也因篇幅關係而撤去，河上肇氏的經濟學講座第二節亦然。這都是使編者深覺不安的地方，讓我在此地對作者或譯者深深地行一鞠躬禮，作為道憲吧。

下期的稿件已經收到的有：Freda Utley 著的日本的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譯自普羅列塔利亞科學）；辯証法的唯物論與死反動的哲學（V. Neovsky著）；還有烏立諾夫伊里基著的辯証論；美國的經濟危機（譯自 國際通信）；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及河上肇的經濟學講座續登下去，不過河上氏的意見，有許多地方是還值得討論的。此外還有幾篇稿子都已答應寫的，但未寄到，我們相信第二期一定會比本期更整齊些。

讀者忠懇的指示和批評，我們十二分地歡迎，此後擬專闢讀者意見一欄，請大家不客氣的指導和督促我們，以期本刊的逐漸改善。

一九三十年，三，七日，佳句記。

燕山書店 出版預告

馬克斯主義批判者之批判

河上肇著

江半庵譯

“大體地說來，經濟學的教授們不外是資本家階級有學識的掌櫃的，哲學的教授們不外是神官僧侶輩有學識的掌櫃的”（列寧）。本書是一方面打碎這些“掌櫃的們”對於馬克斯主義所施的別有心腸的批判；他方面闡明馬克斯主義之基礎理論的東西。所以凡是想明白馬克斯主義之真髓的人，都不可不一讀它；尤其是在“掌櫃的們”之巧妙的無恥的批判層出不窮的今日，更有精讀本書的必要。

內容底一般

關於辯証法的唯物論

辯証法的唯物論之批判底批判

擁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與權力

馬克思底絕對地租論

資本蓄積之窮途

全書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看！

站在新興科學的立場，介紹最正確的革命理論，讀者以少量時間與代價，獲得社會科學基本智識的一—

新智識叢書 出版了

社會主義與進化論

彭列可次克著 傅烈重譯 定價二角

闡明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關係，如何達爾文學說祇能適用在生物進化上，至于社會進化則祇有以生產力之發展把握社會之動力的馬克思主義才能說明。凡欲明瞭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者，不可不一讀它。

譯筆忠實流暢，出版後即經各校讀日文同學採為參考對照之用，其價值可知。

科學的社會主義

Lenin著 喬治譯 定價一角

經機會主義與修正派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 Lenin 氏所重新發掘出來的。本篇即列寧的一篇名著，原名“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當為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戰士來闡明馬克思主義底真髓的。與一般的介紹自屬不同。欲明瞭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者，宜入手一編也。

一九二九年第四季的
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出版預告

E. Varga著

張一如譯
王文謙

I. 美國的危機—世界經濟的危機：

- a. 空想的幻滅。b. 美國危機底原因。c. 現有危機底範圍。
- d. 股票的飛漲與証券交易所的破產——危機底因子。
- e. 有組織的防止危機底方策——無望的企圖。f. 廉價家福特。
- g. 美國資本主義獨占的特質影響於危機底改變。
- h. 由美國危機引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i. 世界市場競爭的增長與戰爭危險的增加。j. 國際對立的加劇，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底到臨。

II. 德國資本主義興起的制限

- a. 生產的發展。b. 生產額與生產力的懸殊。c. 德國資本主義的榨取問題。
- d. 資本的剩餘和缺乏。e. 為雇主利潤增加的鬥爭。

III. 一般之部

- a. 世界經濟底一般觀察。b. 危機及價格問題。c. 貨幣及資本市場。
- d. 失業問題。e. 第二次海牙會議。

IV. 特殊之部

- a. 德意志。b. 法蘭西。c. 意大利。d. 大不列顛。e. 美利堅合衆國。

燕山書店出版

重農學派理論底創設者—

佛蘭士 開納

—其生平及學說—

俄國魯 平著 孫柳杞譯 定價四角

開納是馬克思所尊稱爲科學的經濟學之父的，其經濟表乃企圖說明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第一人。俗流經濟學家不要說不曾完成這個工作，而且不會意識着這種問題。直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上才完成開納所未竟的事業。真的，開納的經濟表也祇有馬克思和盧森堡幾個人充分理解過牠。本書著者魯平氏爲現代蘇聯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在本書上把當時法國農村破產情狀，重農學派的社會背景，其學說及政策一一闡明無遺。譯者在序中說：“現在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現狀正與法國當時的情形相似，欲救濟中國農村經濟，那時的重農學派是值得我們借鏡的。”故不但研究經濟思想史者宜人手一編，即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者，當亦以先覩爲快也。

譯者孫先生留俄六載，本書係從俄文直接翻譯，更爲忠實可靠。

北平燕山書店出版

燕山書店 出版預告
資本論第一卷手冊及語彙

W. H. Tommott著 千家駒譯

本書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簡本，與柯祖基之“馬克思經濟學說”（戴季陶譯）同為解說資本論的名著。本書的特色在它正文後附有 700 餘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用術語底解釋。昂格斯在英譯資本論序中說，讀資本論有一個不能避免的困難就在他所用術語底含義，不但與日常使用的不同，而且與一般經濟學上所使用者有別。本書有 700 餘條馬克思術語的解釋，這個困難自然可以避免了。再，資本論第一卷之所以被稱為最不容易讀的一本書是在他的價值學說，即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區別；差不多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以為馬克思的價值與交換價值是一個東西！本書作者是最先提出價值與交換價值底科學的用語的人。而且，本書如作者自己在序文中所說是“特別為簡明與通俗化資本論前三章——這是資本論全卷中最困難的部分——而作的。”故第一部“商品與貨幣”幾占全書篇幅四分之一，誠可為讀資本論最好的入門書。如此的一部名著無怪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 Eden and Cedar Paul 二氏極力推崇，在新英譯資本論序中稱本書為極有價值之著作，凡讀資本論者所不可不讀，其價值可想而知了。

全書共二十萬字，現在印刷中 準五月出書，
實售洋一元二角。

不日出版的

日文關鍵

金九經人序
周作人編

此書係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系教授金九經先生所編。先生在中國教授日文有年，深感無完善之課本以供我國學子之用。故本其多年蓄積之經驗，參攷舊籍至數十百種，費時二載編成此簡扼明瞭之日文關鍵一書，誠我國讀日文者之福音也。

本書特點 注音用羅馬字母 文法有中文詳解
 取材富藝術興趣 編制用科學方法
 既可當讀本閱讀 又可供文法參考

未讀日文者 得無師自通之效

已讀日文者 收事半功倍之功

本書內容一般

用羅馬字注音，凡平假名片假名都推原其字之來歷，讀者不必苦記而一望便得。

是編乃本書最精彩之部分，爲所有日文書籍得未曾有一編，以最新說明法解說日文語法使讀者不必費功便能瀏覽日文書籍。

選最新穎之論文、隨筆、小品、小說、戲曲、詩歌等現代日本文學之代表作，練習閱讀日文書籍能力，增加讀者之興趣。

中文日譯，日文中譯，於語氣之間，曲傳其神味，可作翻譯之指南看。

第一編 日文發音

第二編 語法大綱

第三編 選文

附錄一 翻譯實例

附錄二 助詞，虛詞，副詞索引

其他細目繁多 不及備載

全書三百餘頁
每冊貰售洋一元四角

現在印刷中
准五月出書
北平燕山書店謹啓